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兵役制度轉型議題之風險感知及政策支持研究—
以軍事訓練役為例

A Study of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 Support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Transformation
Issues: A case of Military Training Service
(Obligatory military service)

研究生：陳彥陵

指導教授：劉大華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五 月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新聞碩士班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兵役制度轉型議題之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研究

—以軍事訓練役為例

本論文係陳彥陵（學號 1090720302）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碩士班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9 年 05 月 11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委員兼召集人	徐振興
指導教授	劉大華
委員	傅文成
委員	徐振興
學系主任	傅文成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5 月 1 1 日

謝誌

時光荏苒，研究所的生涯已到了尾聲，我盡可能的把握住大部分的美好，卻也有些遺憾從指縫溜走。儘管論文寫作過程有艱辛，但到底學習還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因此現在的感覺彷彿站在幸福的高點，心裡卻已預告即將到來的下坡，但或許學習在這裡並不是結束，或許我還能夠邁步向前走。

這兩年收穫的非常多，想說的話也許隻字片語無法說清楚，但我的內心充滿了誠摯的感謝。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劉大華老師，有句話說：「謹慎比大膽要有力量得多」，記得剛開始我對研究題目的想像既天真又粗糙，在老師的引導下思緒才逐漸明朗，也謝謝老師在忙碌之餘仍能幫我修正與指導，老師在研究上的謹慎也深深影響了我；再來要謝謝傅文成老師，碩一時期如果沒有老師的醍醐灌頂，也許今日我的論文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也是老師讓我看到對學術的熱忱可以如此；謝謝徐振興老師，在統計方法上的指導，從來我就是一個對數字不太在行的人，但是老師的教學給了我信心，給了我解決研究問題的利器；謝謝班導師謝奇任老師，時時關心著我們學習的進度，在研究經歷嚴峻的時期，總是能送上暖心的問候。

此外，也要謝謝碩 109 年班新聞系的大家，依倫學長、趙姐、建志學長、郡賢學長、詠昕學姊、賢助學長、彥翰學長、涵筠學姊、品軒、翁翁、倪倪、小白跟思綺，學習環境很重要，真的無法想像沒有你們陪伴的這兩年，特別感謝跟我一起墊底組的思綺，我們常常在最後期限裡掙扎，不過總是能夠熬過來；還有辛苦的孟秋助教，我們推拖拉常常惹你生氣，可你總是不厭其煩的幫我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一起玩、一起打球。

最後，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哥哥、大嫂、弟弟，謝謝你們的支持與包容，這份成果與喜悅還是想第一個分享給你們，我愛你們。也期許自己能夠帶著所學迎接下一個階段的挑戰，當然還是需要最愛的你們陪伴。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陳彥陵 謹誌於北投復興崗

摘要

我國兵役制度在經歷了時空轉變，因應國際、社會環境、戰略需求考量的變遷，進行多次改革，五度調降義務役男役期，役男的訓練與役期長短，在社會上造成了不同的質疑聲音，因而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檢視軍事訓練制度實行，影響台灣民眾對此議題的風險感知程度，探討媒體與人際在影響風險感知中所扮演的傳播角色，以及政治信任與心理距離的影響，再進一步探討風險感知與自我效能感影響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結果顯示，傳統媒體注意與人際傳播對個人風險感知具有顯著正相關，政治信任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心理距離越近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政策支持及行為傾向會受到個人風險感知的影響，然而自我效能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並不具調節效果。最後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政府未來在兵役制度政策推行時，能有效針對目標群眾進行策略性的說明，進而降低風險，提升政策支持度，達到風險溝通與管理之效。

關鍵字：軍事訓練役、媒體注意、人際傳播、風險感知、政治信任、

心理距離、自我效能

Abstract

In Taiwan,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of time and space. The government has reduced the service period of obligatory for five times. The length of training and service period of military training service has caused different sounds of doubt in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litary training system influencing the risk perception degree of Taiwanese people;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issue, als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moreover, to further explore how risk perception and self-efficacy affect policy support and behavior tend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raditional media atten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ersonal risk perception. (2)Political trust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ositively predict the degree of risk perception. (3)Policy support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were affected by personal risk perception. However, (4)self-efficacy had no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study proposed related suggestions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achieve the effect of risk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ilitary training service, media attenti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risk perception, political trust,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elf-efficacy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6
第二章、文獻探討	14
第一節、風險社會與風險感知	14
第二節、媒介與風險傳播	18
第三節、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	27
第四節、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	31
第五節、風險感知、效能感、政策支持度與行為傾向	35
第三章、研究方法	42
第一節、研究設計	42
第二節、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44
第三節、研究程序與預試問卷量表信度分析	53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解釋	57
第一節、風險感知與自變項之資料分析與假設驗證	57
第二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資料分析與假設驗證	70
第三節、自我效能調節效果分析	76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81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82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91
參考文獻	95
一、 中文部分	95
二、 英文部分	101
附錄	122



表目錄

表 1. 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訓期分配	6
表 2. 風險事件常見定義	14
表 3-2-1. 資訊接收管道量表	45
表 3-2-2. 政治信任量表	46
表 3-2-3. 心理距離量表	48
表 3-2-4. 風險感知程度量表	50
表 3-2-5. 政策支持度量表	51
表 3-2-6. 行為傾向量表	52
表 3-2-7. 自我效能感量表	53
表 3-3-1. 預試問卷人口統計變項次數分配表	54
表 3-3-2. 預試問卷題項信度分析表	55
表 4-1-1. 正式問卷人口統計變項次數分配表	59
表 4-1-2. 媒體注意、人際傳播程度次數分配	60
表 4-1-3. 政治信任程度次數分配	61
表 4-1-4. 心理距離次數分配	63

表 4-1-5.風險感知程度次數分配.....	64
表 4-1-6.服役情形及年級與其他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66
表 4-1-7.資訊接收管道、政治信任、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之階層迴歸 分析	69
表 4-2-1.政策支持程度次數分配.....	71
表 4-2-2.行為傾向次數分配.....	72
表 4-2-3.服役情形及年級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差異性檢定.....	72
表 4-2-4.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74
表 4-3-1.自我效能程度次數分配.....	77
表 4-3-2.服役情形及年級與自我效能之差異性檢定.....	78
表 4-3-3.風險感知與自我效能對政策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79
表 4-3-4.風險感知與自我效能對行為傾向之交互作用分析.....	80
表 5.本研究假設檢驗結果	81

圖目錄

圖 1.我國與南韓、新加坡、以色列役期長度比較圖10

圖 2.研究架構圖40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軍隊是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確保國家存在與運作的最基本保障。而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國防戰力、建軍備戰的實際現況能否達成作戰任務，建構國防戰力，則有賴於兵力結構、國防武器、國防預算等等。根據全球火力網站所調查之 2019 年全球軍力排名¹，第 1 名為美國，次之則為俄羅斯及中國大陸，而我國則在全球有納入統計的 137 個國防戰力中排名第 22 位（Global Firepower, 2019），與中國大陸尚有一段差距。就戰力發揮最基本單位而言，訓練有素的人員方能夠合宜操作武器、發揮有效戰力，因此單兵乃是構成國防戰力的根基，意即軍隊為國防戰力的組成要素之一，是國家藉由兵役制度徵召國民而組成（顧傳型，1988）。我國對兵役制度的定義為：「對國家服一定期限之軍事任務」（吳定，2006），而單兵的招募與訓練則依據《兵役法》規定實施，因此在我國服兵役為男性法定之義務，亦是國家組成軍隊的管道，然而義務役制度的轉變卻從 1 年大幅縮

¹ 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的全球軍力排名，係依照 50 項不同指標評比各國軍事力量，考核項目包含陸海空軍武器裝備戰力、可動員人力多寡、國防資源以及國防預算等指標，由此衡量各國軍事力量指數。

短為 4 個月，加上兵員逐年縮減，這種變化造成了社會上不確定的聲音出現，且兵役轉型乃當前我國重要國防政策，因此本節將針對兵役制度的沿革與義務役的型態分別說明。

壹、 兵役制度的變革與兵員縮減

我國因應臺海關係變遷、戰略由攻勢轉守勢的改變及國家經濟能力考量，自民國 82 年起歷經多階段裁兵與役期調整，進一步檢視我國兵役制度的變革，自民國初年即開始實施兵役制度，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幾經變革後，在 36 年 1 月 1 日，國民政府公布實施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服兵役之義務」，我國兵役制度始納入憲法依據。民國 40 年政府遷來台後，因應反共需求、敵情威脅與作戰考量，便開始實施「徵兵制」，而自民國 43 年起，配合「精練常備兵、廣儲後備兵」政策，確認陸軍役男服役 2 年、海、空軍及海軍陸戰隊役男則服役 3 年。

兵員數量縮減始於民國 82 年，106 年國防報告書指出該年推動「十年兵力專案」（民國 82 年—85 年），兵力結構目標為「合理三軍編制及建立基本戰力」，檢討並汰除或整併無效兵力，以精實國防組織，組建小（兵力）、精（武器）、強（戰力）之國防武力，調降總兵員由 49 萬餘人縮減至 45 萬餘人。緊接著民國 85 年，為因應臺海情勢、作戰需求及配合行政院組織

再造工程，政府提出「國軍軍事組織及兵力規劃案」，此即「精實案」（國防部，2017）。

89 年起為因應兵役公平、社會變遷及建軍備戰需要，修正陸、海、空軍役期，統一服滿 1 年 10 個月後，納入後備動員戰力，於 40 歲時除役。民國 93 年，政府推動精進案，國軍兵員再次大幅度的減少，因應國際情勢改變，兩岸戰力不對等成長、且我國國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採購買武器裝備的方式來提升國防戰力，然而，總兵力卻由 38 萬餘人調降為 27 萬餘人。同時，持續擴大招募志願役士兵，朝著「募兵為主、徵兵為輔」的目標前進，而義務役期也確認縮短為 1 年，期能達到「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之目標（洪錦成、施奕暉，2013）。

民國 100 年為持續整建精銳國防勁旅，推行精粹案進行國防結構調整，軍事戰略任務以「不讓敵登陸立足」為方針，同時考量「災害防救」亦為國軍核心任務之一，並推動「募兵制」等措施，調整組織結構並裁減兵員數量，兵力結構由 27 萬餘人下修至 21 萬餘人。由此，國防組織朝著「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之目標發展，透由組織精簡、訓練打造實質戰力，以符合台澎防衛作戰需求（國防部，2017）。

貳、 義務役走向軍事訓練役

在一連串的精簡兵力政策後，行政院核定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83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之役男改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義務役期自此大幅縮短。

由前述可知，我國兵役制度在經歷了時空轉變，因應國際、社會環境、戰略需求考量的變遷，進行多次改革，除因應「全募兵制」而改變徵募兵的比例，更五度調降義務役男役期。觀察現行軍事訓練役的服役做法，可以發現訓練的質與量都相形減少，根據內政部役政署網站公佈之我國現行兵役制度指出依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役男於 19 歲之年起役，在當年接受兵籍調查及體格檢查，檢查結果體位判定為常備役體位者，按徵集順序徵集入營服役（內政部役政署，2017.07.31）。其中，亦明確指出何謂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規定，83 年次以後之役男，自 102 年起，經判定常備役體位者，改徵服 4 個月以內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施訓內容區分為入伍訓練及專長訓練。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徵兵規則第 26 條規定，申請接受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內政部役政署，2018.10.09），意即於利用暑假分兩階段（入伍訓練、專長訓練）完成 4 個月之義務兵役。

針對訓期時數及內容部分（見表 1），在民國 106 年以前的軍事訓練役，訓期採 8 週「入伍訓練」及 8 週「部隊訓練」，後國防部考量為增加役男部隊實務經驗，自 106 年後實施「前 5 後 11」的入伍訓練及部隊訓練；然目前仍維持「前 5 後 11」的訓期階段區分，惟將「部隊訓練」改為「專長訓練」，大體而言，107 年改制後實施方式分為一般專長「整梯整訓」及中級專長「兵監施訓」兩種。一般專長即入伍與專長訓練在同一個新訓旅或幹訓班，依後備部隊動員「一般專長」項目重點訓練「實彈射擊、戰鬥教練、戰術行軍及野營訓練」等課程。中級專長則是抽籤分發至三軍兵監訓練指揮部、中心等單位，實施「戰車、砲兵、化學、工兵、通信」等中級專長訓練（國防部新聞稿，2017.12.19；今日新聞，2017.12.19），意即 107 年以後的役男皆不用下部隊，著重在專長培養，以符合後備動員專長實需。

表 1. 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訓期分配

時間	訓期區分	部隊經驗	備考
106 年前	8 週入伍訓練 8 週部隊訓練	第二階段將分發至本、外 島常備部隊服役。	
106 年 107 年	5 週入伍訓練 11 週部隊訓練	第二階段將分發至本、外 島常備部隊服役。	
107 年後	5 週入伍訓練 11 週專長訓練	第二階段區分： 一般專長（整梯整訓） 中級專長（兵監施訓）	役男無需 下部隊

註：暑期分階段訓練維持兩年各 8 週實施，為一般專長「整梯整訓」。

資料來源：國防部新聞稿（2017.12.19）、今日新聞（2017.12.19）及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此我國在兵役制度中，由義務役走向軍事訓練役即是役期由長縮短、部隊歷練從有到無的轉型，然而面對中共軍事實力的擴張，國軍兵力結構與人員素質必須有效的組織與訓練，面對國防戰力的變化也應保持風險認知，以應對軍事訓練役政策落實後之利弊，並使改革能順利推行。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要達到充實國防戰力的目標，有賴健全的兵役制度，然而，觀察上列我國兵役制度的演變，不難發現常備兵現役役期雖修訂為 1 年定案，但現實狀況是我國 1 年制義務亦已於 107 年底全數退伍，目前役男皆為軍事訓練役別，也就是所謂的 4 個月的軍事

訓練役男。因此，未來後備動員人力將逐漸以受軍事訓練結訓的役男為主，在役期縮短、沒有部隊實務經驗的狀況下，這將是維護國家整體安全必須重視的一塊。現在我國實行的「募、徵併行」似乎仍存在許多不同聲音與疑慮，尤其義務役男役期，時常成為媒體中的有爭議性的討論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實證方法，瞭解民眾對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制度，與我國國防戰力風險感知程度與政策支持度之關聯。

我國軍隊從播遷來台時期約 60 萬人，至現在經歷三階段裁兵（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現役軍人總數約 21.5 萬人，政府期望能以募兵制，補充部隊兵員，並達到長留久用的目標，然而此舉影響了徵兵制因而逐漸縮減役期，藉由縮短役期降低軍事人員維持成本，提高軍隊的專業水準，但許多軍事專家及政府官員皆表示，募兵制進展不如預期，兩岸軍力失衡逐漸加重；反之，國防部新聞稿則明確表示募兵制進程順利，志願役人力穩定成長，預判 109 年底即可達成募兵制招募 90% 計畫目標（國防部新聞稿，2019.07.08）。國防部指出，推動募兵制的目的，是藉由招募與培訓「役期長、意願強、經驗熟」志願役人力，組建「量適、質精、戰力強」之現代化部隊，且遵憲法賦予兵役義務，役男仍徵集接受 4 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完訓後納入後備

動員列管，以達「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之用兵需求（青年日報，2019.07.08）。國防部進一步在臉書專頁發佈貼文澄清「全募兵制」疑慮，針對沒有徵兵制一說，國防部強調憲法賦予的兵役義務並沒有修改（國防部發言人臉書，2019.07.08）。

因此，大家所熟悉的「1年期義務役」轉變成僅需服役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似乎變成了我國兵役轉型的實驗品。義務役士兵只需服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諸多報導指出讓國人極為擔心台灣未來的後備戰力。根據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網站統計公布，現行列管後備軍人約230萬餘人，每年依計畫實施教育（勤務）召集訓練，強化後備軍人專長技能，以因應作戰任務需要。後備動員能量現役人員（含軍事訓練）退伍（結訓、離營、解除召集）後，均須接受後備軍人管理（女性軍、士官依志願），且每年依規定實施教育（勤務）召集訓練，以保持戰力，於戰時能迅速編成動員部隊，共同遂行防衛作戰任務（全民防衛動員室，2019.11.17）。

由上述可知，在實施「全募兵制」（實為募、徵併行）下的國軍部隊，士官兵仍然會退役，並轉為後備軍人，補充後備兵力。但後備兵力則會分為兩情形，一是服役時間較長的志願役退伍後備軍人，其二則是僅服役四個月軍事訓練役的後備軍人，根

據憲法所賦予人民服兵役的義務，未來軍事訓練役退伍的人員將成為後備兵力中的多數，這樣的後備戰力是否能肩負我國地面防衛計畫中所付予的任務，因而受到許多人的質疑。然而，這樣的憂慮，並不僅止出現在國內。2019 年 10 月所舉行的「台美工業會議」，我國與美方在會中進行國防議題之討論與交流，其中在有關軍事訓練役役期部分，美方提出與他國如南韓及以色列等比較，我國役男役期相對上更短，甚至於會中提出我方應審慎思考如何建構「具戰力的後備軍人」（風傳媒，2019.10.09）。研究者進一步比較亦有鄰近威脅國家的南韓、新加坡、以色列與我國義務役制度的差別，單就役期長短而言（見圖 1），新加坡為 2 年，南韓為期約 1 年 8 個月，而以色列實施全民皆兵制度，年滿 18 歲的青年都應服兵役，男性為 2 年 6 個月女性為 2 年。由此可知，我國義務役確實在役期長度上相對更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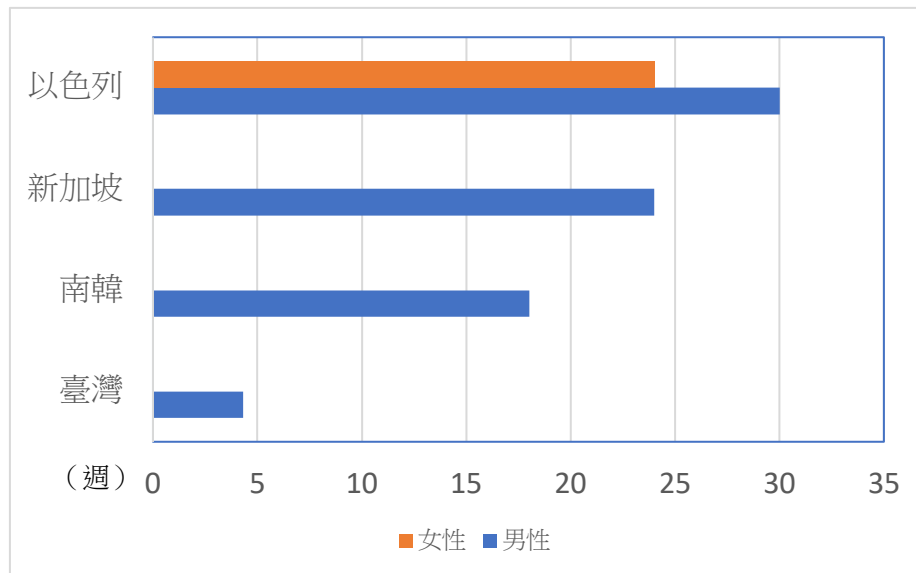


圖 1.我國與南韓、新加坡、以色列役期長度比較圖

資料來源：關鍵評論網（2019）、自由時報（2019）與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一話題亦 ptt 板上引發討論。研究者檢視留言互動意見，普遍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持反對意見，認為毫無戰力可言，甚至有人希望能夠增長役期為 2 年。亦有人認為把只受過第一階段新兵訓練的軍事訓練役男直接往作戰部隊塞，甚至參加演訓充人頭，只是埋下更多的危安因素（自由電子報，2017.10.11）。而根據路透社（2018）報導，儘管台灣與大陸關係緊張，台灣年輕人認為大陸可以用經濟實力摧毀台灣，兩岸無須動用軍事力量，認為「入伍從軍是浪費時間」。

由上述可知，「軍事訓練役」役期的長短與人員素質，是國人憂心部隊與後備戰力的關鍵因素，也是引發軍事訓練役存去的質疑。故兵役轉型下軍事訓練役制度的推動，對現階段的台灣社

會而言，是具有不確定感且影響重大的公共政策，足為當前我國所面臨的風險事件。而過去 Breakwell (2000) 的研究成果證實，多數的國民無法直接接觸到重大政府政策的影響，而是透過媒體的傳播進一步對政策產生認知、對風險程度的感知、支持與否的喜好態度，邱玉蟬、游絲涵 (2016) 指出傳播媒體是風險訊息傳播中的中介的角色，除了傳達特定風險的定義，媒體更是構成了這些定義 (周桂田，2005)，所以媒體報導的角色不可忽略。檢視過去有關風險的許多文獻，其中「風險的社會擴大效應」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簡稱 SARF) 即為探討媒體如何透過反覆報導風險事件、造成民眾與社會團體高度的關注，進而影響除了風險事件本身之認知外，亦包括了後續公民參與及政策決策過程，其中狂牛症即為典型 (Kasperson et al., 2001, p. 9)，此外，在風險擴大的框架中，Kasperson (2003) 等人指出這兩個放大站即是媒體和人際網絡，因此本研究欲了解兵役制度轉行議題中的軍事訓練役制度，是否會經歷這樣的過程，透由媒體及人際傳播而產生更大程度的風險認知。

此外，在一個風險事件中，民眾知識、對社會與政治機構的信任皆能影響風險擴大的效果。信任在過去的風險研究中也得到廣泛的討論，發現民眾的信任感與風險感知之間的積極關係

(Poortinga & Pidgeon, 2003 ; Visschers et al.,2011 ; Vainio et al.,2014)，而當中尤以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較常被提出來討論。Fox (2019) 等人則認為人們影對潛在威脅的方式，會根據感知到風險事件與自身的距離來判斷，因此若由解釋水平理論 (Construal Level Theory) 來看，風險議題與自身的遠近將可能是判別風險的重要依據。另外，從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的角度切入，自我效能亦是風險研究中常被提及之概念，自我效能係指人們對自己採取行動的判斷 (Bandura, 1982)。在氣候風險領域中發現，自我效能越高的民眾，對環境更有可能採取友善的行為 (施琮仁，2017)，因此自我效能驅使個人對風險議題付諸行動的可能。

故本研究目的即在探究媒體報導的影響下，軍事訓練役制度影響政治及國防議題對民眾的風險感知影響程度為何？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是否會影響媒體對民眾風險判斷的影響？此外，因應傳播技術發展，現在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益趨多樣，除了傳統媒體 (如報紙、電視與廣播) 上的新聞之外，網路新聞及社群媒體等媒介也是資訊尋求的重要管道，人際傳播亦為獲取訊息的重要來源，因此，亦加入網路新聞注意與人際傳播作為變項，比較傳統媒體、新媒體使用與人際傳播，對民眾造成風險感

知與認知處理上的差異？並進一步檢視我國民眾的心理距離與效能感，是否會影響風險感知程度與政策立場的改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 一、 民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為何。
- 二、 探討民眾接收兵役制度轉型資訊的管道、對政策的信任及心理距離對風險感知之關聯。
- 三、 探討民眾對於兵役制度轉型的風險感知與效能感對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影響。

本研究試圖以實證方法瞭解兵役轉型議題中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民眾的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之看法，俾供政府部門、國防部在兵役制度轉型溝通與執行層面上，能更有效的運用傳播媒介，已達風險溝通與管理之成效。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風險社會與風險感知

壹、風險與風險社會

「風險」的定義並沒有一套完美的標準，檢視過去風險研究的相關文獻，風險的概念大致可分類為預期發生、機率分佈、不確定性和事件。本研究整理多位學者的闡述（見表 2），將這些解釋分為兩類普遍的定義：1.風險是一種情況或事件，其中涉及到人類價值（包括人類自身）的某物，其結果是不確定的（項次 1-6）；2.風險是某一事件或某一活動相對於人類珍視的某物所產生的不確定後果（項次 7-14）。

表 2. 風險事件常見定義

項次	定義	學者
1	風險等於預期損失。	Willis (2007)
2	風險等於預期無用性。	Campbell (2005)
3	風險是導致不好結果的可能性。	Graham & Weiner (1995)
4	風險是對負面影響的機率與嚴重程度的衡量。	Lowrance (1976)
5	風險包括「意外受傷或損失」。	Morgan & Henrion (1990) ; Random House (1966)
6	風險，是關係到人的行為或決策的主動性與利益層面的選擇。	周桂田、張淳美 (2006)

7	風險是涉及人類價值的東西(包括人類本身) 和不確定結果的情況或事件。	Rosa (1998, 2003)
8	風險是事件發生機率及其後果嚴重程度的組合關係。	ISO (2002) ; Vlek & Stallen (1981, p. 239- 240) ; 黃清賢 (1996, p.35-36) ; 陳定海 (2004, p. 20)
9	風險被定義為一組情景，每種情景都有機率和結果。	Kaplan & Garrick (1981) ; Kaplan (1991)
10	某一特定地區和特定期間，由於某一特定危險(威脅事件) 而造成的預期損失(生命、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和經濟活動中斷)	Downing et al. (2001)
11	風險係指一不確定性高、對社會、個人影響程度之理性計算，甚或涉及行為的改變。	Hansson (2002)
12	風險等於事件或後果和相關不確定性的二維組合(事件是否會發生，後果將是什麼)。	Aven (2007)
13	風險是一個事件或一個活動對人類價值的東西的不確定後果。	ISO (2009)
14	風險=危險×脆弱性×暴露	Geosci. Aust (2014)

資料來源：Campbell (2005)、Spiegelhalter, D. (2017)及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風險社會」的概念，Beck (1992) 把風險定義為「處理因現代化本身所引起的危險(hazards)與不安全(insecurity)的一套系統方法」。Beck 認為人類社會早期並沒有「風險」這個概念，而是「危險」。他認為風險的產生並不是被理解為由神或自然所為，

而是人類決定和選擇的後果，由於社會、科技不斷在進步的進步，整個現代化、工業化，其實就是整個處理傳統社會危險的過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和野心可能基於獲取「商品」的邏輯，但這一過程本身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壞處」（Beck, 1992），也就是說人類試圖解決、改善一件事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問題(Beck & Willms, 2001)。因此，可以說風險涉及了人為決策，意即風險是來自於人為因素，而成為經濟、技術和科學發展的「副作用」（Beck, 2009）。

由上可知，Beck 的觀點即是風險性質會因為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從過去科技部尚不發達、尚未全球化的時代，風險多存在於自然當中，當科技進步、全球化與世界政體改變，風險變得更趨近於社會性問題。Beck 對於「風險社會」的意涵是多面向的，並不是單指生態危機，而是囊括政治、社會、現代化等概念。周桂田（2016）在評風險社會研究中亦說到：風險即是決策，改變決策，就能改變風險。因此當今許多科技、氣候、經濟的風險研究中，逐漸轉向政治的實踐。而在更完善風險社會研究方面，Beck（2009, 2015, 2016）重點分析了三個風險領域：環境、經濟和安全風險。而本研究所討論之軍事訓練役制度，其訓練成效直接影響動員戰力及戰時國土防衛能力，在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關係下，關乎我國

人民人身安全與福祉，如 Heng (2006) 及 Beck (2016) 所言，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情勢與國家安全已然擴大了風險社會的型態，若將兩岸戰爭發生的機率和我國應對能力作機率的計算，其後果充滿著不確定性。由上述可知，我國現行軍事訓練役政策，在訓練質量方面都造成了懷疑與擔憂，因此對台灣民眾而言，軍事訓練役制度是一個關乎我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貳、風險感知

過去研究中，Douglas 和 Wildavsky (1982, p. 30) 強調風險感知的理解，受人類如何看待他們的幸福受到威脅，以及他們如何評估有害後果的機率和程度影響，因此，與其說是預測物理性的問題結果，不如說是價值觀、態度、社會影響和文化認同。Ockwell 與 Rydin (2006) 亦指出風險感知是一種地方的、常民的、經驗性與直觀的知識。而 Mileti 與 Sorensen (1990) 則將風險感知定義為當聽到警告訊息時，所導致不同的結果和回應。當個人收到警告，他們的風險知覺是由不同的、連續的階段產生，學者將之描述為「聽到—確認—理解—相信—個人化—回應」(Mileti O'brien, 1992, p. 41)，因此的風險評估，往往都是以個人主觀為考量 (Slovic, 1999; McComas, 2006)，是人們對不期望發生事件的心理感受、認識與建構 (Slovic, 2000)，亦或是對危害及其風險的解釋 (Sullivan

Wiley, Short Gianotti, 2017)。而 Kellens、Terpstra 和 De Maeyer (2013)則定義了風險感知是建立在心理計量、啟發和行為學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Bubek、Botzen 和 Aerts (2012, p.1483)則指出,「感知風險」或「危險程度」指的是對某一事件或活動的「感知機率」和「感知後果」的綜合衡量。在國內研究中,李明穎(2014)指出人們面對不可預知的風險威脅,會引發不同的心理反應。周桂田(2004)在科技風險研究中,認為風險感知不僅是對風險的不確定產生焦慮感,亦可能影響社會的發展。根據上述文獻論述,可知道「風險感知」是一種接受警訊時,人們理解並內化為認知的心理過程,是一種包含了社會文化、個人經驗、主觀的「感覺」,甚至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而非物理性或機率的評量。因而本研究所言之風險感知,即為認知軍事訓練役制度的施行,對國家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風險的評估,而產生的對該制度施行的回應與擔憂。研究者認為對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風險認知,係影響兵役政策推行與國防戰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為本研究之重要變項。

第二節、媒介與風險傳播

壹、媒體在風險傳播中的角色

媒體風險傳播研究的本意，即在探討民眾對風險的認知與態度形成的因素（傅文成，2018）。而大眾傳播媒體對風險判斷的影響一直是傳播學研究（尤其風險傳播研究）中，最廣泛的課題之一（So, 2012）。過去在風險溝通文獻中即發現透過媒體傳播的風險訊息，會影響閱聽人對風險事件的感知程度（周桂田，2003）。可知當社會上出現重大的議題時，媒體總是幫助民眾瞭解事件的重要角色（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因此可以知道媒體便是民眾接觸與認知外在世界的重要來管道。而拜科技進步之賜，訊息的發布與接收有更便利多元的管道，今天的人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更加瞭解情況，並要求透明的事實與訊息快速流動，多人發佈和塑造訊息會改變消息傳遞以及人們所閱讀及所相信的內容，但其中問題就在於它塑造訊息與傳播的方式，可能會引發更大恐懼。

一般大眾多數仰賴媒體獲得公共議題的資訊，因此媒體在風險傳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體除傳播風險議題外，更會影響影響閱聽眾對事件形成認知的機制，例如在涵化理論的觀點來看，民眾可能因而在心裡產生風險事件對社會或個人影響的具體樣貌，並持有對該議題的認知及態度，而民眾也會對風險事件產生不同程度的認知。而以議題設定理論（agenda setting theory）為例，學者

認為公眾認知在社會重要問題上大多是由媒體引起的 (Graber, 1984)，換句話說，一個事件所受到媒體報導的數量，給予大眾明顯的線索，便會使大眾對議題產生重要性的認知。(Wanta & Ghanem, 2007, p.37; McCombs, 2004; Weaver et al., 2004)。而在 Combs 和 Slovic(1979)研究中即發現，媒體報導的內容與大眾認為具有風險的事情一樣的；新聞媒體對議題的討論往往會影響公眾對健康問題與風險的理解甚鉅，並影響消費者的知識、信仰和行為 (Dixon et al., 2009; Harris et al., 2005; Meissner et al., 2003)。當大眾傳播媒體對某一問題進行頻繁且高度突顯的選擇性報導，便會使人們認為這些問題比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因此媒體透過傳播風險事件的形式，確實可能會影響民眾對該議題的風險感知。

此外，「風險的社會擴大效應」研究 (SARF) (Kasperson et al., 1988)，是長期以來風險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徵，根據 SARF 的說法，與風險「事件」或風險相關的風險由包括媒體在內的各種個人和社會「放大站」進行符號化、處理和表示 (Kasperson et al., 1988)，這一情形會加強或削弱公眾對風險的認知，未能反映出世界的狀況，可能對風險事件本身產生深遠影響，Kasperson(2005)亦指出風險認知是受媒體報導，人口因素和心理因素。因此，可以

知道媒體作為向公眾傳遞資訊的關鍵角色，與公眾所持有的風險態度及其所表現的行為有關聯。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及為狂牛症的風險感知，會隨著接受到的訊息質量而增加或衰減（Lewis, R. E., & Tyshenko, M. G., 2009; Yang, J., & Goddard, E., 2011），意即媒體與人際皆能作為影響閱聽眾風險認知的途徑，且這個途徑具有強化或減弱風險認知的作用。

綜上所述，媒體與人際傳播扮演了傳播重大社會訊息的重要角色。雖然有些時候媒體並沒有提供明確的結論，但其選擇和在不同事件之間建立聯繫會讓閱聽眾自然得出某種結論，因此其如何影響民眾產生風險態度，仍待更多實證研究來檢視。本研究探討的軍事訓練役制度案例，按國家《兵役法》所律定的「徵、募併行制」，其中「徵兵制」應該是有使兵源充足、動員後備作戰及節省人事成本等優點，進而獲購、研發精密的武器裝備（王榮慶，2016），但軍事訓練役施行至今，輿論普遍認為役期太短，無法形成可恃戰力。

在媒體中所描述之軍事訓練役，是由於我國政策快速向募兵轉型，精簡的人員需面對沉重戰備訓練，並隨時支援災害防救，官兵承擔極大壓力，然而後備兵力動員編裝與訓練無法形成有效戰力，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亦指出，近來中國大陸透過經濟支持高速建軍，已然對國軍臺海防衛作戰構成嚴峻挑戰。反之，我方國防預算卻未見增長(聯合新聞網, 2019.12.03)，甚至媒體報導亦隨著民國 82 年次(含) 以前出生役男服 1 年常備兵現役人員在民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全數退伍後，等同於「徵兵制的」告終(聯合新聞網, 2018.12.17)。另根據今日新聞報導(2019.01.23) 臉書爆料公社社團發起是否贊成恢復徵兵制的調查，其中有 77% 的網友支持恢復徵兵制。舉凡新聞媒體、ptt 上都曾造成熱烈報導與討論，甚至在「台美工業會議」中為美方提出來需重新審視軍事訓練役制度(中央社, 2019.10.23)，可見媒體報導中役期過短、戰力成效、甚至認為是浪費時間已變成國防戰力最大的隱憂，因此軍事訓練役制度在本質上確實可能會造成國防戰力的衝擊，研究者認為該政策已然成為媒體中的風險事件，具有不確定與擔憂的因素。

貳、資訊接收管道與風險感知

過去研究發現不同資訊接收管道會影響民眾的風險感知(俞蘋, 2019)，這些管道大致上可分為傳統媒體、網路媒體與人際傳播(Moorman & Matulich, 1993 ; Nonoyama, Tsurugi, Shirai,

Ishikawa, & Horiguchi, 2005)。許多研究表明，通過媒體或人際管道接觸風險資訊的頻率是恐懼或風險的顯著預測因素。例如，Morton 和 Duck (2001) 研究發現，媒體接觸與健康風險評估有關係，且接觸與對癌症的恐懼 (Nelissen et al., 2014) 和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存在直接關係 (Nellis & Savage, 2012; Silver et al., 2013)。惟傳統探討風險感知的文章多以媒體使用程度來檢視風險態度的行成，但媒體使用並不同於關注風險事件，因此媒介注意變成為在研究媒介效果上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所謂注意係指閱聽人在接收資訊並處理訊息時，其對於訊息的感知集中程度 (Jeffres, 1997, p.27-28)。注意的概念可以使研究者更清楚驗證不同的媒體所產生的效果上的差異。

一、傳統媒體與風險感知

過去研究指出，報紙與電視新聞的框架效果是不一樣的，電視新聞報導有即時、篇幅短、輪帶播放的本質，在事件相關背景知識或分析資料較為不足 (Iyengar, 1991)，因此對於民眾風險的感知程度與態度會跟報紙媒體有所差異。陳憶寧 (2011) 在檢視美國牛肉進口風險事件時，也發現不同媒體議題的關注程度會產生不同的風險感知效果，媒體使用越多，會產生更高的風險感知程度。施

琮仁(2015)亦發現，不同媒體對於閱聽眾的感知形成的影響力不盡相同。報紙容易促發系統性思考，有助知識的積累，形成對風險議題之判斷，所以報紙能夠使閱聽眾有機會仔細咀嚼並思考，而電視可能只是打開但僅只瀏覽新聞，雖會讓閱聽眾以較少的心思理解議題，但電視重複播放特質，在長期涵化影響下，民眾對奈米科技可能會產生正面認知(施琮仁,2015)，抑或使風險感知更為增加(Chaffee & Schleuder, 1986)。因此，閱聽人在不同傳統媒介的資訊曝露下，風險判斷及態度的行成也互有差別。

二、網路媒體與風險感知

而網際網路的出現也改變了閱聽眾對資訊取得的自由程度，民眾在上網時，能不受限制的選擇與尋求資訊(Eveland & Dunwoody, 2001; Tewksbury & Althaus, 2000)。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在當今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新媒體更能提供民眾實踐公共議題的可能性(Dart, 2014)。新媒體雙向、多對多、去中心式的傳播、意見領袖與方便連結等特性，的確使公共議題滲透至更廣大的族群，引發更多迴響與討論；這樣的數位化的公共場域，增加了民眾的公共參與，網際網路甚至可能縮減知溝、減少資訊分配不均的情形(Cacciatore, Scheufele, & Corley, 2012)。由於網路能賦予民眾匿

名性，使得民眾上網時可能同時擁有多重特質的身分，在網際網路上的發言也較不受限制，因此網際網路也被認為是民意的表達，與公共政策的意見交流場域(Naumov, 2014)。由上述可知，網路已逐漸成為公眾參與的較容易的途徑，在我國亦能觀察到此一現象，例如在 2013 年間網友製作 kuso 的反核懶人包影片，如「挺什麼核啦反什麼核啦」、「戲說核四」等，在網際網路中被廣泛分享；此外，因為簽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所引起的太陽花學運中，亦有多數參與者透過網友製作的「懶人包」來瞭解服貿協議的內容，並使用如臉書(Facebook)等社群網站為主要資訊來源，可知網際網路世界已成為閱聽眾瀏覽相關議題的平台，且作為自身判斷是否採取行動或參加相關集會遊行之重要依據。(Jennings, 2014)。

由上述可知，新媒體(網路)的影響方面已不能忽略，依據國發會 2017 年數位調查發現，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曾經上網民眾亦由 94 年的 62.7% 增為 107 年 86.5%，換算為人數約 1,830 萬人，而行動上網則有 98.2% 民眾使用過，另在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三次(2014 年)統計資料顯示，全台灣會上網、手機也有上網功能的成年人口中，最高為 83% 的人透過網路接收新聞，以手機獲取新聞與透過報紙看新聞則分別為 69% 與 52%。顯見網際網

路與行動裝置已日漸普及，並逐漸成為國人主要獲取新聞的管道之一。

三、 人際傳播與風險感知

然而，儘管個人可能會單獨遇到和評估危險，但他們更有可能從他人那裡認知到風險，風險評估將涉及各種社會過程。如前述所說，風險社會擴大模型（SARF）認為，個人、團體和機構可以充當「放大站」，在傳播風險時放大或減弱風險感知，Kasperson(2003) 等人指出這兩個站即是媒體和人際網絡。因此，除上列探討媒介的傳播效果外，人際交往領域亦是重要的中介因素，但過去文獻卻沒有一致的結果。Coleman(1993) 發現討論對某些社會風險有影響，但對個人風險沒有影響，而 Trumbo (1995) 則發現風險觀念是由人際討論頻率所產生的，這些個體傾向於將風險放大；而 Yang, C. (2018) 等人也發現人際的傳播頻率越高，便越會將對茲卡病毒的恐懼放大；然而有關生物研究設施所感知的風險和益處的研究表明，頻率效應對感知利益有影響，但對感知風險沒有關聯（Binder et al., 2011）；國內研究也有不一致的情形，如陳憶寧（2011）研究發現，人際討論與風險的態度與認知沒有關聯，而在核災風險研究中則發現，人際討論可以正向預測風險重要性認知（陳憶寧，

2014)，李宛庭(2018)也發現人際傳播越頻繁，官兵對兩岸戰爭的風險感知越高。綜上所述，人際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儘管該傳播模式的結果可能有爭議，但最簡單的解釋是，不管是何種媒介，對一個危險議題的資訊重複播放，就足以引起恐懼。

因此，鑑於民眾對於新舊媒體在獲取科學訊息時的使用習慣，以及人際傳播的重要性，本研究因此聚焦在傳統媒體(報紙、電視、廣播)、新媒體(網路)與人際傳播的管道，分別檢驗媒體注意程度，對風險感知態度的影響，因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a：使用傳統媒體關注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假設 1b：使用新媒體關注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假設 1c：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第三節、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

在民主政體國家中，政權來自民意授與，因此當民眾相信政府時，便會相信其會考慮自身的福祉，反之，則會為了確保自身利益

不受侵犯，而限制執政者之權力，因此所謂的政治信任便是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也是政體運作順遂的重要基石，且在危機時期的政治信任更突顯出其重要性（陳憶寧，2011）。

學者 Deutsch（1958）是最早對信任與風險之關聯進行研究的學者，認為風險是因為信任而產生。陳憶寧（2011）指出信任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元素：依賴（reliance）和風險（risk）。由於民眾大多不具備足夠的科學及風險知識來做為自身風險判斷的考量，因此多依賴政府、專家提供的訊息。Lee et al.（2005）更指出「信任」包括多種態樣，如對經濟領袖或政府的信任、消息來源、法律與規範、科學家及公民團體的信任等。檢視政治溝通、風險感知和健康溝通研究領域，皆表明信任是公眾對政府政策的關注與支持的重要預測因數（Krosnick et al., 2006; Malka et al., 2009; Poortinga & Pidgeon, 2003; Slovic, 1993）。而我國每逢國家總統大選，政治總不免與國防政策掛鉤，候選人以縮短役期爭取役男族群的選票，致使四個月的軍事訓練，不能接受足夠時間的軍事訓練，亦無機會投入部隊訓練與專長培養，且面對中國大陸共軍軍力不斷增強，尤其是近、中程飛彈與空中及兩棲作戰能的增強，除造成對國防與後備戰力的隱憂，我國受到的威脅亦逐漸提高，而本研究所探討的軍

事訓練役制度，為關乎國防戰力之重要國防政策，因此研究者將援引「政治信任」的概念作文獻的爬梳。

Hetherington (2005) 認為，政治信任感是民眾認知到的政府施政結果與民眾期望之間的一致性程度。Li (2004) 認為政治信任通常被定義為公民對政府或政治制度將產生的結果符合他們的期望的信念或信心。在信任的對象上，Easton (1965) 在政治體系中將民眾對政治的信任分為三個對象，分別為：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典則或稱之政體 (political regime) 以及執政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y)，意即對「政府」的信任、對「政策」的信任以及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因此可以將政治信任理解為民眾對政府整體運作的信心，其中包含了政府官員及施政措施，亦是保障政府體制和政策延續的根本，故本研究考量兵役制度之廣泛性，將「政治信任」指涉為民眾對政府針對軍事訓練役度施行整體的信心。

檢視過去學者研究，Citrin 與 Muste (1999) 指出若民眾認為政府效率不彰或對政府作為缺乏信心，就易產生政治不信任感，進而影響到執政的順遂與政體的穩定；相反的，當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時，則偏向相信政府為以人民福祉為優先考量，

從而影響個人更為守法的行為（Chanley, 2002），林天生（2013）在探討溫室效應的風險感知研究中指出，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可以降低民眾對災害風險的擔憂與恐懼感。在食品安全風險研究中政治信任亦扮演相同的角色，Feng et al.（2014）則發現增強公眾對官方機構的信任可能是降低公眾對消費藥品風險認知的一種潛在方式。國內也不乏相關研究，陳憶寧（2014）發現，政治信任程度愈低，愈是認為核能風險重要性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愈高，則愈支持核能。可見民眾的政治信任程度在面臨風險議題時，會成為其決定自身立場的參考依據（傅文成，2018）。而林天生（2013）在探討溫室效應的風險感知研究中指出，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可以降低民眾對災害風險的擔憂與恐懼感。在食品安全風險研究中政治信任亦扮演相同的角色，Chen（2013）發現對政府的信任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感知呈正相關關係，但這種關係是間接的，受食品製造商和零售商感知的調節。

因此，在我國政策逐漸去軍事化的過程，以及中國大陸軍力擴張的威脅下，本研究欲探討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任程度及風險感知的變化。並根據上述文獻的整理，研究者認為在軍事訓練

制度上，民眾的政治信任會影響媒體對個人產生風險的態度，因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2：政治信任越低，大學生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第四節、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

學者 Fox (2019) 等人認為人們會根據感知到風險事件與自身的距離，並通過不同的心理機制來應對潛在威脅。而從時間、社會或空間的角度來看，個體對某個情況的評估會因為該情況與自身接近與否而有所不同 (Fleury-Bahi, 2008; Gifford et al., 2009; Trope & Liberman, 2010)。因此可理解為心理距離並非議題的重要性認知，而是對議題的鄰近性感知。在這樣的觀念下，本研究考慮心理距離的因素，欲瞭解國防政策或國防事務普遍在大學生的感知距離中為接近或遙遠，這種心理上的感知距離對其風險認知影響程度。而心理距離源自解釋水準理論，探討的是某個事物與自身距離遠近而產生抽象或具體的認知 (Trope & Liberman, 2010)。以下將就心理距離概念作文獻的爬梳。

壹、解釋水平理論 (Construal Level Theory)：

解釋水平理論是（CLT）是近十幾年來新興發展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學派之一，主要的概念為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一詞，可以理解為事件或對象的感知距離取決於它們在心理上的解釋。隨著感知距離的增加，物體或事件被解釋成更抽象的、非文字化的、廣義的名詞。當物體或事件被認為更接近時，它們呈現出更具體、脈絡化和詳細的特徵（Bar-Anan Y et al., 2006; Bar-Anan Y et al., 2007; Liberman N & Trope Y., 2008; Trope Y. et al., 2007; Trope Y. & Liberman N., 2010）。而 Bar-Anan 和 Trope（2006）及 Trope 與 Liberman（2010）確定了心理距離的四個主要維度：地理（事件/對象和感知者之間的空間距離），時間（對象/事件和感知者之間的時間距離）、社會（感知到他人和自身之間的相似性，考慮的是某件事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或是發生在相似的人身上），和不確定性（或稱機率距離，即為感知到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後續的研究也指出，心理距離的增加會產生更抽象和非文字化的解釋，進而減少在一系列決策下的行為參與（Trope Y. et al., 2007.; Trope Y. & Liberman N., 2010）。Wang S.（2018）等人則指出心理距離為一種表明人們與特定物體、事件或人的距離或距離的指標，更廣泛的解釋則為所關心的事物與自我之間的關係。考量軍事訓練役制度政策之特

性，為我國當前實行之國防政策，研究者認為面對中國大陸軍力擴張、我國國防戰力變化情形在地理性上的與我國十分靠近，且軍事訓練役制度也正是我國當前義務役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地理性心理距離上不另加探討，而不確定性心理距離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政策性質，非自然或科技等風險有專家、科學家的研究證實其損害程度，且衡量國防戰力並無明確可靠的數據可檢視，因此本研究將援引心理距離認知中時間及社會性心理距離做探討。

貳、 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

Godber (2005a, 2005b) 及 Henrich、McClure 與 Crozier (2015) 的研究說明風險感知也可能因利益相關者的角色而異。換句話說，人們會根據感知到的空間、時間、身份和社會距離，通過不同的心理機制應對潛在的威脅。根據 CLT 理論，個體在做出感知較近威脅和感知較遠威脅的決策時，會利用不同的風險心理機制，並優先考慮這些機制的不同特徵 (Trope and Liberman, 2003; Liberman and Trope, 2008)。心理上與我們親近的物體和人會比那些距離較遠的物體和人引發更強烈的情緒 (Hackenbracht & Gasper, 2013)，Brügger (2016) 等人發現，讓氣候威脅更接近於個體，會因為恐懼心理，而增加決策的重要性

認知。CLT 亦表明了心理距離會影響對風險的感知和反應。在氣候研究中，冰層融化對許多人來說是地理上遙遠的地方，這種心理距離降低了風險感知（ Jones et al., 2017; Spence et al., 2012; Van der Linden, 2017 ），Guillard（ 2019 ）等人研究發現與氣候變化和洪水有關的心理距離可以解釋對洪水風險的感知。亦有研究發現減少氣候變化的心理距離可能會加劇人們的感知風險（ Brügger, Dessai, Devine-Wright, Morton, & Pidgeon, 2015; Spence, Poortinga, & Pidgeon, 2012 ）。可知當參與者感覺更接近所描繪的環境時，即當心理距離越近時，他們感知到對環境的威脅越大，並表現出更強烈的意圖（ Fox et al., 2019 ）。健康風險研究中，Chandran（ 2004 ）等人則操弄了人們感知到的心臟病風險，發現心理距離近的框架增強了參與者的風險意識並增加了他們的行為傾向，且距離近框架的參與者認為威脅更為嚴重。

綜上所述，研究認為心理距離是影響對風險事件認知的重要因素，過去的研究雖多以自然風險為案例，在社會及國防的層面上並無相關研究，然風險可以理解為一特定事件，會對人們的生活環境或社會造成潛在威脅，因此研究者認為心理距離亦適合作為研究社會風險的重要因子。基於上述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對風險事件的心理距離可以正向預測民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

第五節、風險感知、效能感、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

在貝克風險社會的概念下，隨著世界的進步，因科技、決策等伴隨出現的多樣風險，若不加以正視，就可能演變成危機（WDR, 2014），因此探討風險感知對政策與行為的目的便是為了使風險得到管理，才有可能為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安全和進步。因此風險感知將是影響兵役政策重要的一環。

在前述提到風險感知的定義，有賴主觀意識的認知，Slovic（2004）更指出，民眾看待風險事件，最主要的是觀感，它是評估風險十分重要的因素，當對風險的觀感越正向，則風險評估會隨之降低。Sjöberg et al.（2004）亦指出風險感知是指個體對某一特定事件的機率及其後果的評估，或對威脅的性質及其嚴重性的主觀性估計（Sjöberg, 1998）。它是一種完全依賴於個體文化和認知的心理建構（Slovic, 1992; Sjöberg, 2000）。

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

對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是受主觀意識所影響的，因此每個人對風險的評估都不相同，感知到的風險程度亦有所差異。而本研究

所探討的政策支持度，研究者定義為評估風險後，自身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採取的支持或反對立場；行為傾向則是對風險產生認知後，其行為的改變，在本研究中則指服役行為及關注國防事務的行為。檢視過去學者的研究，梁世武（2014）研究發現不同風險認知程度對核電支持度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另一篇在核能議題的研究亦發現民眾對政府越是信任、核能風險感知越低，並傾向支持核能發電政策（陳憶寧，2014）。傅文成、陳靜君（2017）則發現受訪者認為推動募兵制的風險越大，自身與親友投入的機會也越低，但仍會傾向支持現階段台灣社會需要推動募兵制。楊意菁、徐美苓（2012）在全球暖化研究中發現在風險傳播中問題認知高、問題限制認知低以及情境涉入高者，傾向支持制定相關政策。施琮仁（2015）在奈米科技風險傳播研究中則發現風險感知則會降低奈米政策支持度。Zhu（2016）等人研究發現風險感知與反核行為意圖息息相關。徐美苓（2019）亦發現越覺得空氣污染威脅越高者，防治空汙的行為意向也越高，根據上列研究發現，可知風險感知是影響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的重要因素。

此外，陳憶寧（2011）認為民眾決定支持一項政策與否的重要參考因素便是政黨傾向。可知民眾會因執政者是否與自己支持的黨派相同立場而作為風險判斷與政策立場的依據（Metzgar&

Rouse, 2013)，因此，政黨傾向將有可能影響民眾的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而 Slovic (2004) 亦指出，民眾對風險的評估會因為年紀、性別或者是社會階層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受訪者人口背景及政黨傾向作為控制變項。

基於上述實證研究及理論推導，研究者認為風險感知將是預測人們態度及行為的重要因素，因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a：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政策支持度越低。

假設 4b：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行為傾向越高。

二、效能感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

Bandura (1997, 2001, 2004, 2006) 提出之自我效能和回應效能、集體效能的概念，為社會生態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並區分了行動的容易性（自我效能）和行動的有效性（回應效能）。其中自我效能指的是通過自己的能力能夠達到目標的信念，儘管這種信念不代表他們的實際能力，意即自我效能是一種判斷自己有沒有能力做某件事情的信念（Bandura, 1982）。因此，自我效能感更強的人，會為自己所追求事物，或解決某項問題而投入了更多的努力（Bandura, 1997, 1982）。

過去氣候風險研究領域研究中，在延伸平行模式（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的理論框架下，有研究發現即使民眾對氣候變遷嚴重性的有一定的認知，也並不一定改變行為意圖，因為自我效能感低落，亦即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Witte, 1992）。而回應效能預測行為意圖（Brody et al., 2012; Tobler, Visschers, & Siegrist, 2012; Truelove, 2009; Truelove & Parks, 2012）、氣候風險感知（Brody et al., 2008），亦有研究發現個人行為意圖由自我效能預測（Heath & Gifford, 2006; Stenhouse, 2015; Truelove, 2009; Bostrom, A. et al., 2018），資訊尋求行為亦然（Mead et al., 2012）。Brody（2008）等人與 O'Connor（1999）等人則發現越有可能採取正面行動或對相關政策的支持的人，會越認為自己能透過自身所採取之行動或藉由人際網絡影響他人來減緩全球暖化的問題。而國內研究也發現民眾自我效能越高，對待環境更傾向於友善行為（徐美苓、楊意菁，2011；徐美苓、施琮仁，2014；施琮仁，2017）。施琮仁（2017）在氣候變遷研究中發現，行動策略知識和自我效能、回應效能、集體效能感具有正面關係，也會分別增進行為意圖。而在健康行為中，發現自我效能感是促使健康行為改變的一種強大的認知能力（Bandura, 1997；Luszczynska & Schwarzer, 2015），在對抽菸的

研究中，自我效能信念被確定為減少每天吸菸的數量，和戒菸後長期禁欲的一個關鍵心理因素（ Baldwin et al., 2006; Dijkstra & Vries, 2000; Gwaltney, et al., 2009 ），Deng 和 Liu（ 2017 ）則發現健康自我效能調節了感知健康風險與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

綜上所述，可知自我效能為預測個人行為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探討之軍事訓練役制度在社會輿論下風險性質，以及受訪者（大學生）對國防戰力所能採取的行為的容易性，研究者認為大學生的自我效能將會加強風險感對行為傾向之關係。基於上述實證研究及理論推導，因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5：閱聽眾的自我效能感會調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度的關係。



總整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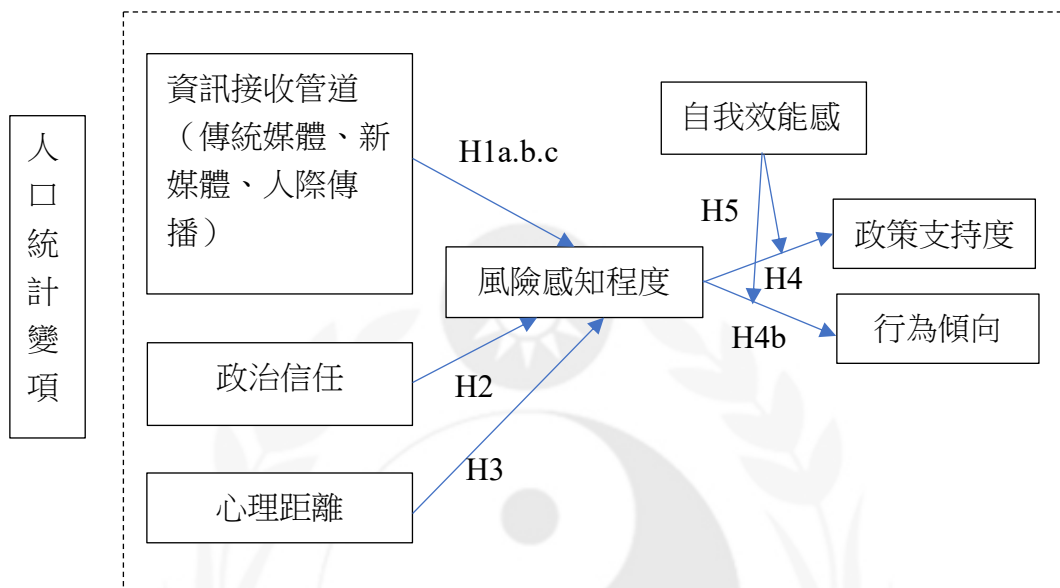


圖 2.研究架構圖 (研究者自行繪製)

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H1a：使用傳統媒體關注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H1b：使用新媒體關注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H1c：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H2：政治信任程度越低，預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H3：心理距離越近，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H4a：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政策支持度越低。

H4b：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行為傾向度越高。

H5：閱聽眾的自我效能感會調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度、行為傾向的關係。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媒體關注、信任感、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對於自我效能與政策支持度的關聯。因傳播科技發展迅速，智慧型手機日漸普及，及考量成本及便利性的情況下，本研究將使用將問卷數位化並使用問卷調查法執行問卷發放，研究對象則為台北市大學男生。本章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介紹本研究使用之問卷調查法與樣本選擇；第二節則援引先前學者研究，並說明測量變項之定義與操作；第三節則側重在於研究相關程序及量表信度分析。

第一節、研究設計

壹、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是在探討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媒體關注程度、信任感、心理距離、風險感知程度、自我效能對政策支持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調查執行上，使用問卷調查法，因問卷調查法主要是評估態度、信念、行為的普遍性與分佈，以及有關受訪者的事實資料，因此可以藉由量表結果利用統計方法推論至母群體，並將樣本與母體的誤差最小化（Weisberg, 2008）。而問卷調查法種類繁多，舉凡面對面調查、紙本調查、電話調查、郵寄調查及網路

問卷調查等等（梁世武等，2016）。此外，因應科技發展與傳播技術的演進，智慧型手機與網路幾乎是民眾不可或缺的設備，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合作的 106 通訊市場調查結果摘要報告指出，民眾智慧型手機使用比例高達 93.5%，遠高於非智慧型手機的 5.8%，其中又以 25-34 歲使用率為 100% 最高，16-24 歲使用率亦達 98.6%，換言之，我國大學生這個年齡層，幾乎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可見智慧型手機已與人們密不可分；此外在 2018 年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與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合作的台灣網路報告中指出，台灣民眾網最常使用的裝置為手機（96.8%），因此，基於問卷調查的特性，與我國人民資訊設備與網路普遍使用情形，研究者使用線上問卷工具，並於試前由研究者與受訪者面對面說明問卷的填答方式，後發放問卷連結之二維條碼（QR code），以利受訪者用智慧型手機填答。

貳、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因軍事訓練役制度與大學男生最有相關，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設定為大學男生，且根據憲法第 20 條規定，每位男性都需要服兵役，檢視過去研究，並無針對即將起役的男性為樣本，因此該群體的意見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影響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的重

要參考。另考量到大學的特性不同，本研究抽樣方法為採「分層叢集抽樣」，第一層為抽「學校」，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台北市計有 24 所大專院校院，為本研究母體清冊，為符合樣本異質性，按比例抽取台北市公、私立大專院校，第二層抽樣單位是「班級」，亦即在各分層當中，使所有「班級」都有相同的被抽取機率。依據各分層所需的樣本數，在各分層中選取足夠數量的受訪學校及受訪班，並以網路問卷填答方式，於 12 月 12 日（星期二）先行針對初定稿之問卷進行測試訪問，通過前測信度檢驗後修訂問卷，後實施正式問卷發放。

第二節、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包含媒體注意程度、人際傳播、政治信任與心理距離，而依變項則為風險感知、政策支持度與行為傾向；調節變項為自我效能感，以下說明主要變項測量方式：

一、資訊接收管道變項

研究者設定 Likert 6 點量表，分別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為選項。調查受訪者在不同媒介的軍事訓練役議題的關注程度。傳統媒體部分，題項包含「您在電視關注有關於軍事訓

練役的新聞報導」；「您在報紙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您在廣播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新媒體則為「您在網路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人際傳播題向為「您是從學校教官、親朋好友得知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相關訊息」（見表 3-2-1）。

表 3-2-1. 資訊接收管道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傳統媒體	1	您是從電視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1	2	3	4	5	6
	2	您是從報紙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1	2	3	4	5	6
	3	您是從廣播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1	2	3	4	5	6
網路媒體	4	您是從網路關注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1	2	3	4	5	6
人際傳播	5	您是從學校教官、親朋好友得知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政治信任

研究者設定 Likert 6 點量表，分別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為選項，分別測量政治信任及對資訊來源的信任。政治信任部分，本研究參酌 Huurne (2009) 等人、陳憶寧 (2014)、

傅文成、陳靜君（2017）過去風險感知研究的政治信任問項，題目建構如下：「我認為政府重視我國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之影響」、「我相信政府有能力制定完善兵役政策以維護我國國防戰力結構」、「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持續推行軍事訓練役制度之後，我國國防將會進步？」、「我同意『政府對於兵役制度與國防戰力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這種說法」，四題相加除以4所得之平均分數越低，則表示政治信任感越低（見表3-2-2）。

表 3-2-2. 政治信任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政治信任	1	我認為政府重視我國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之影響。	1	2	3	4	5	6
	2	我相信政府有能力制定完善兵役政策以維護我國國防戰力結構。	1	2	3	4	5	6
	3	我相信政府持續推行軍事訓練役制度之後，我國國防將會進步。	1	2	3	4	5	6
	4	我同意『政府對於兵役制度與國防戰力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這種說法。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心理距離

研究者設定 Likert 6 點量表，分別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為選項，分別測量心理距離的程度。參考 Jones, C., Hine, D. W., & Marks, A. D. G. (2016) 研究過去氣候風險感知心理距離的問項，題目建構如下：「軍事訓練役制度正在危害我國與人民安全。」、「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的影響意味著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下一代的人更有可能感受到軍事訓練役制度推行的影響。」、「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可能對像我一樣的人產生很大的影響。」、「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一定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不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會對我認識的人產生重大影響。」，其中 3、6 題為反向題，分數轉換後，6 題加總之平均分數越高，則心理距離感越近（見表 3-2-3）。

表 3-2-3. 心理距離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時間性	1	軍事訓練役制度正在危害我國與人民安全。	1	2	3	4	5	6
	2	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的影響意味著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1	2	3	4	5	6
	3	下一代的人更有可能感受到軍事訓練役制度推行的影響。	1	2	3	4	5	6
社會性	4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可能對像我一樣的人產生很大的影響。	1	2	3	4	5	6
	5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一定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家人。	1	2	3	4	5	6
	6	我不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會對我認識的人產生重大影響。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項如下：性別、年級、學校性質、年級。性別分為「男性」及「女性」；年級分為：「大學一年級」、「大學二年級」、「大學三年級」、「大學四年級」；學校性質則設定為「公立普通大學」、「私立普通大學」、「公立科技大學（含技術學院）」、「私立科技大學（含技術學院）」；政黨傾向分為「泛綠（民進黨、台聯、台灣基進

等) 」, 「 泛 藍 (國 民 黨 、 新 黨 、 親 民 黨 等) 」, 「 沒 有 特 定 黨 派 」。

五、 風險感知變項

此構面參照陳憶寧 (2011) 及傅文成、陳靜君 (2017) 風險感知研究建構量表, 調查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 使用李克特 6 點量表, 選項有從「非常不擔心」到「非常擔心」;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對損害我國國防戰力。」;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衝擊我國軍力結構。」;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無法因應中共軍力威脅」;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在兩岸發生衝突可能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使用李克特 6 點量表, 選項有從「非常不擔心」到「非常擔心」, 將 4 題項加總後平均, 所得分數越高, 表示風險感知的程度越高 (見表 3-2-4)。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表 3-2-4. 風險感知程度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擔心	不擔心	有點不擔心	有點擔心	擔心	非常擔心
國防損害風險感知	1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損害我國國防戰力。	1	2	3	4	5	6
	2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衝擊我國軍力結構。	1	2	3	4	5	6
	3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無法因應中共軍力威脅	1	2	3	4	5	6
	4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在兩岸發生衝突時可能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政策支持度變項

此構面參考徐美苓、楊意菁（2012）、施琮仁（2015）、傅文成（2019）研究中政策支持量表，使用李克特 6 點量表，選項有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題目建構如下：「有人認為政府縮短軍事訓練役役期縮能節省國防預算成本，來研發及購買高科技武器，也有人說役期縮短會損害國防戰力與國家安全，我仍贊成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施。」、「有人說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我國而言有害而無益，我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政府應恢復 1 年制的義務役。」其中第 2、3 題為反向題，轉換後將 3

題項的結果加總後之平均分數愈高，表示軍事訓練役的政策支持傾向愈高（見表 3-2-5）。

表 3-2-5. 政策支持度量表

構 題 面 號	問 項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 策 支 持	1 有人認為政府縮短軍事訓練役役期縮能節省國防預算成本，來研發及購買高科技武器，也有人說役期縮短會損害國防戰力與國家安全，我仍贊成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施。	1	2	3	4	5	6
	2 有人說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我國而言有害而無益，我同意這種說法。	1	2	3	4	5	6
	3 我認為政府應恢復 1 年制的義務役。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行為傾向變項：

在行為傾向方面參考陳逸寧（2011）、傅文成、陳靜君（2014）蔡明峰（2016）的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建構受訪者對國防戰力威脅相關的行為傾向包含「因應役期縮短帶來的國防威脅，服役過程我會更認真訓練。」；「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不會躲避或延後服兵役。」，使用李克特 6 點量

表，選項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將兩題相加後除以 2，所得分數越高越是會有行為上的改變（見表 3-2-6）。

表 3-2-6. 行為傾向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政策支持	1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不會躲避或延後服兵役。	1	2	3	4	5	6
	2	因應役期縮短帶來的國防威脅，服役過程我會更認真訓練。	1	2	3	4	5	6
	3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的影響，我會更關注國防事務。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自我效能感變項

此構面參照施琮仁（2017）風險感知研究中自我效能量表，調查閱聽眾自我效能感，使用李克特 6 點量表，選項有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題目建構如下：「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在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造成之國防安全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改變我對政策的支持行動，將有助

於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所帶來的威脅」，4 題加總後平均分數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高（見表 3-2-7）。

表 3-2-7. 自我效能感量表

構面	題號	問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自我效能感	1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	1	2	3	4	5	6
	2	在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	1	2	3	4	5	6
	3	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造成之國防安全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	1	2	3	4	5	6
	4	改變我對政策的支持行動，將有助於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所帶來的威脅。	1	2	3	4	5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研究程序與預試問卷量表信度分析

一、預試問卷

為確保問本研究卷題項之信度，本研究於 12 月 12 日（星期二）先針對台北市大學男性隨機發放預試問卷，共回收問卷 100 份，有效問卷 97 份，人口統計變項詳如表 3-3-1。學校性質當中公立大學比例為最高（57.7%），最低為私立科技大學（6.2%）；年級則以四年級為大宗（58.8%）；服役情形則為尚

未服役最多（43.3%），已完成服役次之（34%）；最後政黨傾向則有一半以上為無特定黨派（52.6%）。

表 3-3-1.預試問卷人口統計變項次數分配表

學校性質	公立普通大學	公立科技大學	私立普通大學	私立科技大學
	n=56 57.7%	n=19 19.6%	n=16 16.5%	n=6 6.2%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n=3 3.1%	n=33 34%	n=4 4.1%	n=57 58.8%
服役情形	尚未服役	分階段服役	已完成服役	不需服役
	n=42 43.3%	n=19 19.6%	n=33 34%	n=3 3.1%
政黨傾向	泛綠（民進黨、台聯、台灣基進等）	泛藍（國民黨、新黨、親民黨等）	沒有特定黨派	
	n=15 15.5%	n=31 31.9%	n=51 52.6%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研究者使用 SPSS 24 版進行信、效度分析，使用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信度，信度低於 0.7 之題項將予以刪除，其中媒體注意程度為主觀事實性問題，不予以檢驗信度；政治信任共計 4 題，Cronbach's α 值為.855；心理距離共計 6 題，時間性構面 Cronbach's α 值為.812，社會性構面 Cronbach's α 值為.766；風險感知共計 4 題，Cronbach's α 值為.921；政策支持共計 3 題，Cronbach's α 值為.706；自我效能共計 4 題，Cronbach's α 值

為.879；行為傾向共計 3 題，Cronbach's α 值為.833。各構面皆達良好以上信度，預試問卷詳細分析結果表 3-3-2。

表 3-3-2.預試問卷題項信度分析表

變項	題目	平均數	構面信度
政治信任	我認為政府重視我國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之影響。	4.44	0.855
	我相信政府有我相信政府有能力制定完善兵役政策以維護我國國防戰力結構。	4.36	
	我相信政府持我相信政府持續推行軍事訓練役制度之後，我國國防將會進步。	4.35	
	我同意『政府對於兵役制度與國防戰力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這種說法。	4.38	
時間心理距離	我認為政軍事訓練役制度此刻正在危害國家與人民安全。	4.39	0.812
	軍事訓練役制度對現階段國防戰力造成的影響意味著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4.45	
	下一代的人更有可能感受到軍事訓練役制度推行的影響。	4.29	
社會心理距離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可能對像我一樣的人產生很大的影響。	4.41	0.766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一定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家人。	4.39	
	我不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會對我認識的人產生重大影響。	4.07	
風險感知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對損害我國國防戰力。	4.42	0.921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衝擊我國軍力結構。	4.38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無法因應中共軍力威脅。	4.42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在兩岸發生衝突時可能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4.27	
政策 支持	有人認為政府縮短軍事訓練役役期縮能節省國防預算成本，來研發及購買高科技武器，也有人說役期縮短會損害國防戰力與國家安全，我仍贊成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施。	4.33	0.706
	有人說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我國而言有害而無益，我同意這種說法。	4.27	
	我認為政府應恢復 1 年制的義務役。	4.27	
自我 效能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	4.42	0.879
	在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	4.38	
	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造成之國防安全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	4.42	
	改變我對政策的支持行動，將有助於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所帶來的威脅。	4.27	
行為 傾向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不會躲避或延後服兵役。	4.51	0.883
	因應役期縮短帶來的國防威脅，服役過程我會更認真訓練。	4.35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的影響，我會更關注國防事務。	4.1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解釋

本章針對正式問卷所收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此檢驗變項間之關聯，並驗證研究之假設。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影響風險感知之因素探討，第二節為風險感知影響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之關係，第三節則為自我效能的調節作用分析，各節包含變數之描述性統計、差異性檢定與推論統計，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影響風險感知變數之資料分析與假設驗證

壹、人口統計變項分析：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以台北市大學男性為樣本母體，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台北市共有 24 所大專院校院，108 學年度學士及二技、四技學生計有 183,741 位學生，其中男性有 84,769 位，在 95%信心水準， $\pm 3\%$ 抽樣誤差的情況下，目標樣本數為 1053。在考量時間、經費及人力的狀況下，本研究採分層叢集抽樣，第一層抽學校，台北市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的比例為 15:9，按比例抽取符合數量之大專院校，一般大學 8 所、科技大學 5 所，第二層為抽班級每所大學各 2 個班，並使用問卷調查方式，由研究者至各班級統一發放問卷連結之二維條碼（QR code），以提高回收率，問卷施測期

間為 2020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25 日，共計 2 週，問卷回收 1,138 份，扣除無效樣本 231 份，有效問卷為 907 份。

二、 人口統計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項包含「學校性質」、「年級」、「服役情形」、「政黨傾向」等 4 項。有效樣本為 907 位，其中公立普通大學為最多，共 387 位（42.7%），公立科技大學次之共 314 位（34.6%），私立普通大學 123 位（13.6%），私立科技大學 83 位（9.2%）；年級以一年級為最多，共 335 位（36.9%），四年級次之，共 238 位（26.2%），三年級共 178 位（19.6%），二年級最少共 156 位（17.2%）；服役情形有九成學生尚未服役共 825 位（91%），分階段服役 37 位（4.1%），已完成服役 22 位（2.4%），不需服役則有 23 位（2.5%）；政黨傾向約七成學生沒有特定黨派，共 632 位（69.7%），泛綠則為 215 位（23.7%），最少則為泛藍 60 位（6.6%）。詳細人口變項次數如表 4-1-1。

表 4-1-1.正式問卷人口統計變項次數分配表

學校性質	公立普通大學	公立科技大學	私立普通大學	私立科技大學
	n=387	n=314	n=123	n=83
	42.7%	34.6%	13.6%	9.2%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n=335	n=156	n=178	n=238
	36.9%	17.2%	19.6%	26.2%
服役情形	尚未服役	分階段服役	已完成服役	不需服役
	n=825	n=37	n=22	n=23
	91%	4.1%	2.4%	2.5%
政黨傾向	泛藍（國民黨、新黨、親民黨等）	泛綠（民進黨、台聯、台灣基進等）	沒有特定黨派	
	n=60	n=215	n=632	
	6.6%	23.7%	69.7%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貳、資訊接收管道、政治信任、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描述性

統計分析：

一、資訊接收管道：

受訪者回答對電視新聞注意程度中，回答「同意」有 33.5% 為最高、「有點同意」有 31.5% 次之；受訪者回答對報紙新聞注意程度中，其中回答「不同意」有 24.8% 為最高、「非常不同意」有 23.4% 次之；受訪者回答對廣播新聞注意程度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有 32.3% 為最高、「不同意」有 25.8% 次之；受訪者回答對網路新聞注意程度中，其中回答「同意」有 52.6%

為最高、「有點同意」有 29.3%次之；受訪者回答對人際傳播程度中，其中回答「同意」有 59.9%為最高、「有點同意」有 28.1%次之（詳見表 4-1-2.）。

由上述可得知透過人際傳播注意程度的比例最高（89.5%），其次是網路（82.7%），電視（65.3%）再次之，報紙（35.2%）與廣播（23%）則被較少的使用作為或去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的途徑。可以確認的是，傳統媒體在大學生作為獲取兵役制度訊息的來源已不及新媒體，然而特別的是，儘管普遍認為年輕人使用網路程度較高，但在軍事訓練役的議題上，人際傳播的程度更甚之，可見此議題在人際之間受到較大程度的討論。

表 4-1-2.媒體注意、人際傳播程度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資 訊 接 收 管 道	電視	n=94	n=115	n=105	n=286	n=304	n=3	n=907	3.66
	新聞	10.4%	12.7%	11.6%	31.5%	33.5%	0.3%	100%	
	報紙	n=212	n=225	n=150	n=198	n=121	n=1	n=907	2.77
	新聞	23.4%	24.8%	16.5%	21.8%	13.3%	0.1%	100%	
	廣播	n=293	n=234	n=171	n=127	n=80	n=2	n=907	2.42
	新聞	32.3%	25.8%	18.9%	14%	8.8%	0.2%	100%	
	網路	n=51	n=45	n=61	n=266	n=477	n=7	n=907	4.21
	新聞	5.6%	5%	6.7%	29.3%	52.6%	0.8%	100%	
	人際	n=29	n=32	n=34	n=255	n=543	n=14	n=907	4.43
	傳播	3.2%	3.5%	3.7%	28.1%	59.9%	1.5%	100%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二、 政治信任

其中有關政治信任的題項方面，第一題詢問政府對政策造成國防戰力威脅的重視的同意程度，回答「有點同意」38.3%為最高、「同意」33.8%次之；第二題詢問對政府有應處能力的同意程度，回答「有點同意」38.3%最高、「同意」33.8%次之；第三題在詢問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回答「同意」37%為最高、「有點同意」34.8%次之；第四題在詢問政府政策透明的信任，回答「同意」35.4%為最高、「有點同意」34.4%次之（詳見表 4-1-3.）。可知在政府在應對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的影響中，受訪者的政治信任程度平均分數為普通偏向有點同意，且有超過七成受訪者對政策及政府是信任的。

表 4-1-3.政治信任程度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重視 程度	n=45 5%	n=67 7.4%	n=133 14.7%	n=347 38.3%	n=307 33.8%	n=8 0.9%	n=907 100%	3.91
政府 能力	n=32 3.7%	n=59 6.5%	n=150 16.5%	n=316 34.8%	n=339 37.4%	n=9 1%	n=907 100%	3.99
政策 信任	n=37 4.1%	n=57 6.3%	n=149 16.4%	n=316 34.8%	n=336 37%	n=12 1.3%	n=907 100%	3.98
政策 透明	n=32 3.5%	n=73 8%	n=159 17.5%	n=312 34.4%	n=321 35.4%	n=10 1.1%	n=907 100%	3.93
構面 平均值	3.95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三、 心理距離

心理距離構面中，在時間性維度「我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行此刻正在危害國家與人民」的題項，其中回答「有點不同意」40.5%為最高、「有點同意」33.5%次之；「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行對現階段國防戰力造成的影響，意味著我們必須立刻應對這個問題」回答「有點同意」61.1%為最高、「有點不同意」26.6%次之；「未來幾年內，軍事訓練役制度不太可能危害國防與人民安全」題項中，回答「有點同意」50.4%為最高、「有點不同意」20.9%次之；「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可能對類似像我一樣的人產生很大的影響」題項中，回答「有點同意」39.1%為最高、「同意」28.8%次之；「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一定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家人」題項中，回答「有點同意」36.5%為最高、「同意」25.7%次之；「我不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會對我認識的人產生重大的影響」題項中，回答「有點不同意」31.3%為最高、「有點同意」27%次之（詳見表 4-1-4.）。從數據上可以發現，受訪者在社會性的心理距離感知較時間性心理距離平均分數更高，亦即在感受該政策將會影響的社會層面與自身相似的程度較高，因而心理距離感知較近。

表 4-1-4.心理距離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時間性	正在發生	n=25 2.8%	n=184 20.3%	n=357 40.5%	n=304 33.5%	n=10 1.1%	n=17 1.9%	n=907 100%	3.16
	立刻解決	n=13 1.4%	n=51 5.6%	n=241 26.6%	n=554 61.1%	n=22 2.4%	n=26 2.9%	n=907 100%	3.66
	未來幾年	n=14 1.5%	n=179 19.7%	n=457 50.4%	n=190 20.9%	n=60 6.6%	n=7 0.8%	n=907 100%	3.14
	構面 平均值	3.32							
	社會性								
社會性	自身相同	n=18 2%	n=41 4.5%	n=132 14.6%	n=355 39.1%	n=261 28.8%	n=100 11%	n=907 100%	4.21
	自身家人	n=18 2%	n=61 6.7%	n=165 18.2%	n=331 36.5%	n=233 25.7%	n=99 10.9%	n=907 100%	4.1
	認識之人	n=32 3.5%	n=99 10.9%	n=245 27%	n=284 31.3%	n=186 20.5%	n=61 6.7%	n=907 100%	3.75
	構面 平均值	4.02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四、軍事訓練役制度風險感知

風險感知構面中，在「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持續實行可能損害我國國防戰力」的題項，其中回答「有點不同意」31%為最高、「有點同意」27.3%次之；「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持續實行可能衝擊我國軍力結構」的題項，其中回答「有點同意」31.2%為最高、「有點不同意」29.7%次之；「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持續實行可能無法因應中共軍力威脅」的題項，其中回答「有點同意」30.9%為最高、「同意」22.7%次之；「我擔心軍事

訓練役制度持續實行的情況下，若兩岸發生衝突時國軍部隊可能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題項，回答「有點同意」33.1%為最高、「有點不同意」20.9%次之（詳見表 4-1-5.）。可知受訪者的風險感知程度平均分數（ $M=3.66$ ）為普通偏向有點同意，且有五成至六成受訪者對國防戰力感到擔憂。

表 4-1-5.風險感知程度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戰力 損害	n=52 5.7%	n=144 15.9%	n=281 31%	n=248 27.3%	n=135 14.9%	n=47 5.2%	n=907 100%	3.45
國防 結構	n=43 4.7%	n=121 13.3%	n=269 29.7%	n=283 31.2%	n=141 15.5%	n=50 5.5%	n=907 100%	3.56
戰力 失衡	n=46 5.1%	n=99 10.9%	n=186 20.5%	n=280 30.9%	n=206 22.7%	n=90 9.9%	n=907 100%	3.85
作戰 能力	n=42 4.6%	n=108 11.9%	n=190 20.9%	n=300 33.1%	n=188 20.7%	n=79 8.7%	n=907 100%	3.79
構面 平均值	3.66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參、人口統計變項與資訊接收管道、政治信任、心理距離、風險感知之差異性檢定

在人口統計變項部分，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不同服役情形在電視及廣播新聞注意、政治信任、時間性心理距離、風險感知構面皆有顯著差異（見表 4-1-6），進一步檢視其在電視新聞注意程度之顯著差異（ $F=3.72, p<.05$ ），經 Scheffe 事後比

較顯示，已完成服役（ $M=4.59, SD=1.008$ ）為最高，顯著大於（ $p<.05$ ）尚未服役（ $M=3.64, SD=1.331$ ）。

在廣播新聞的注意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F=5.637, p<.01$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已完成服役（ $M=3.23, SD=1.478$ ）顯著大於（ $p<.05$ ）尚未服役（ $M=2.39, SD=1.296$ ），亦顯著大於（ $p<.05$ ）分階段服役（ $M=2.19, SD=1.198$ ）。

政治信任程度上整體有顯著差異（ $F=2.943, p<.05$ ），已完成服役（ $M=4.4, SD=0.889$ ）為最高，惟組間差異未達顯著水準。可見已完成兵役的大學生，相較於未服役、不需服役或正在服役的大學生，對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較高。

在時間性心理距離方面整體有顯著差異（ $F=3.285, p<.05$ ），不需服役（ $M=3.57, SD=0.867$ ）為最高，惟組間差異未達顯著水準。可知服役與否會造成心理感知的遠近差異，本研究中不需服役，意即體位判定不合格者，對於軍事訓練役政策的影響的感知反而最接近。在風險感知方面亦有顯著差異（ $F=2.619, p<.05$ ），不需服役（ $M=4.05, SD=1.058$ ）為最高，惟組間未達顯著水準。可知不需服役人員表顯出較為擔憂的現象。

此外，年級在網路新聞注意程度（ $F=5.208, p<.01$ ）與政治信任（ $F=3.213, p<.05$ ）上有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

在網路新聞注意程度上，四年級學生（ $M=4.41$, $SD=1.063$ ）顯著大於（ $P<.01$ ）一年級學生（ $M=4.04$, $SD=1.219$ ）。

政治信任方面，三年級學生（ $M=4.14$, $SD=0.767$ ）顯著大於（ $P<.05$ ）一年級學生（ $M=3.9$, $SD=0.862$ ）。可知高年級受高等教育程度較長的人員相對於僅接受一年大學教育，對政府政策呈現出較高的信任。

由上可知，大學生有當兵與否與年級的高低，對軍事訓練役議題的認知確實存在差異，這部分將在第五章進行討論。

表 4-1-6.服役情形及年級與其他變項之差異性檢定

		服役情形					年級				
		尚未服役	分階段服役	已完成服役	不需服役	F 值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F 值
資訊接收管道	電視	3.64	3.73	4.59	3.61	3.72*	3.55	3.6	3.85	3.72	2.194
	報紙	2.75	2.78	3.27	3.22	1.872	2.8	2.77	2.89	2.65	1.129
	廣播	2.39	2.19	3.23	3.13	5.637**	2.48	2.36	2.53	2.29	1.625
	網路	4.19	4.54	4.27	4.04	1.287	4.04	4.2	4.25	4.41	5.208**
	人際	4.41	4.68	4.59	4.3	1.19	4.37	4.4	4.44	4.51	1.051
政治信任		3.93	4.1	4.4	4.21	2.943*	3.9	3.95	4.14	3.89	3.213*
時間心理距離		3.29	3.52	3.56	3.57	3.285*	3.31	3.38	3.37	3.24	1.764
社會心理距離		4.03	4.04	3.83	3.91	0.413	4.04	3.97	3.96	4.06	0.573
風險感知		3.63	3.98	3.88	4.05	2.619*	3.63	3.73	3.73	3.62	0.641

註* $p<.05$ ** $p<.01$ *** $p<.001$

肆、 假設驗證

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來驗證資訊接收管道、政治信任、心理距離與軍事訓練役制度風險感知之間的關係。

H1a：使用傳統媒體注意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H1b：使用新媒體注意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風險感知越高。

H1c：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H2：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也越高。

H3：心理距離越近，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傳統媒體（報紙、電視、廣播）、新媒體（網路）、人際傳播、政治信任與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分析結果如表 4-1-7，除第一層次外，其餘四個模型皆有最佳迴歸線存在。

首先將政治傾向放在第一階層作為控制變項，模型顯示該控制變項並不能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F=2.933, df=906, p>.05$ ），下一個階層檢驗傳統媒體與新媒對風險感知的預測力，在控制了政

黨傾向之後，可以增加 2.2% 的變異量（ $F=6.64$, $df=906$, $p<.001$ ），因此可以利用此一迴歸模型預測媒體關注程度對風險感知的改變，在控制其他變項狀況下，其中僅傳統媒體的注意程度（ $\beta=0.118$, $p<.01$ ）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有顯著預測力，意即使用傳統媒體注意軍事訓練役議題的程度越高，國防戰力受損風險感知亦越高。而新媒體的注意程度與風險感知無顯著相關（ $\beta=.055$, $p>.05$ ），因此 H1a 成立；H1b 不成立。

第三個模型為檢驗人際傳播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在控制上述變項情形下，人際傳播程度顯著增加了 0.6% 的變異（ $F=6.536$, $df=906$, $p<.01$ ），且在控制其他變相的情形下，人際傳播對風險感知有顯著預測力（ $\beta=0.83$, $p<.05$ ），意即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的風險感知程度就越高，因此 H1c 成立。

第四個模型為檢驗政治信任對風險感知之效果，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政黨傾向與媒體注意的主要效果後，政治信任顯著增加 1.3% 的變異（ $F=7.577$, $df=906$, $p<.001$ ），且在控制其他變相的情形下，政治信任對風險感知有顯著解釋力（ $\beta=-0.099$, $p<.01$ ），意即受訪者政治信任程度越高，風險感知就越低，因此 H2 成立。

第五個模型為檢驗心理距離對風險感知之效果，結果顯示控制了以上變項後，心理距離顯著增加了 16.8% 的變異（ $F=30.927$, $df=906$, $p<.001$ ），其中時間性心理距離對風險感知有顯著解釋力（ $\beta=.412$, $p<.001$ ），意即在時間上所感知的心理距離越近，風險感知程度越高，因此 H3 部分成立（時間性心理距離）。

表 4-1-7. 資訊接收管道、政治信任、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之階層迴歸分析

	風險感知					共線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允差	VIF
	β	β	β	β	β		
Step1							
泛藍	-.029	-.038	-.038	-.047	-.064*	.967	1.035
泛綠	-.079**	-.073*	-.075*	-.07*	-.053	.956	1.046
Step2							
傳統媒體注意		.118**	.111**	.152***	.085*	.716	1.397
網路媒體注意		.055	.039	.043	.041	.787	1.271
Step3							
人際傳播			.083*	.111**	.1**	.876	1.142
Step3							
政治信任				-.099**	-.099**	.797	1.255
Step4							
時間心理距離					.412***	.968	1.034
社會心理距離					.05	.96	1.041
Total R ²	.006	.029***	.03*	.051**	.217***		
ΔR^2		.022***	.006*	.013***	.168***		
F	2.933	6.64***	6.536***	7.577***	30.927***		
ΔF		10.287***	5.974*	12.366***	96.172***		
N			907				

註 * $p<.05$ ** $p<.01$ *** $p<.001$

第二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資料分

析與假設驗證

壹、 風險感知、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描述性統計：

一、 政策支持

在政策支持程度方面，題項「有人認為政府縮短軍事訓練役役期縮短能節省國防預算成本，來研發及購買高科技武器，也有人說役期縮短會損害國防戰力與國家安全，我仍贊成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施。」的問題中，回答「有點同意」48.2%為最高、「同意」23%次之；而在「有人說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我國而言有害而無益，我同意這種說法。」的問題中，回答「有點不同意」41.5%為最高、「有點同意」27.7%次之；「我認為政府應恢復1年制的義務役。」的問題中，回答「非常不同意」31%為最高、「有點不同意」22.4%次之（詳見表4-2-1.）。可知有六至七成受訪者支持軍事訓練制度的施行。

表 4-2-1.政策支持程度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贊成 實施	n=18 2%	n=31 3.4%	n=149 16.4%	n=437 48.2%	n=209 23%	n=63 6.9%	n=907 100%	4.08
有害 無益	n=15 1.7%	n=62 6.8%	n=251 27.7%	n=376 41.5%	n=143 15.8%	n=60 6.6%	n=907 100%	3.82
恢復 舊制	n=25 2.8%	n=51 5.6%	n=159 17.5%	n=203 22.4%	n=188 20.7%	n=281 31%	n=907 100%	4.46
構面 平均值				4.12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二、行為傾向

研究者詢問軍事訓練役制度相關的行為傾向中，第一題項「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不會逃避或延後服兵役。」中，回答「同意」37%為最高、「有點同意」30.8%次之，而在「因應役期縮短帶來的國防威脅，服役過程我會更認真訓練。」題項中，回答「有點同意」38.4%為最高、「同意」27.2%次之；而「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的影響，我會更關注國防事務。」，其中回答「有點同意」43.3%為最高、「同意」27.7%次之（詳見表 4-2-2.）。可見約有將近八成的受訪者會因為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而改變自身的服役行為或關注國防事務的程度。

表 4-2-2.行為傾向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逃避	n=49	n=38	n=84	n=279	n=336	n=121	n=907	4.3
兵役	5.4%	4.2%	9.3%	30.8%	37%	13.3%	100%	
認真	n=52	n=52	n=119	n=348	n=247	n=89	n=907	4.05
訓練	5.7%	5.7%	13.1%	38.4%	27.2%	9.8%	100%	
關注	n=41	n=47	n=92	n=393	n=251	n=83	n=907	4.12
國防	4.5%	5.2%	10.1%	43.3%	27.7%	9.2%	100%	
構面 平均值	4.16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貳、人口統計變項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差異性檢定：

在人口統計變項部分，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不同服役情形及年級的不同在政策支持及行為傾向上沒有顯著差異（見表 4-2-3）。可知，有當過兵與沒當過兵的大學生，對軍事訓練役議題的政策立場並沒有明顯的差別；而在年級部分，高年級受更長時間軍訓教育與低年級相比，改變行為的程度也並無明顯的不同。

表 4-2-3.服役情形及年級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差異性檢定

	服役情形				F 值	年級				F 值
	尚未 服役	分階 段服 役	已完 成服 役	不需 服役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政策 支持	4.14	3.88	3.83	3.94	2.013	4.05	4.09	4.14	4.22	1.651
行為 傾向	4.13	4.55	4.42	4.16	2.355	4.1	4.19	4.21	4.17	0.567

註 *p<.05 **p<.01 ***p<.001

參、 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檢驗軍事訓練役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關係：

H4a：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政策支持度越低。

H4b：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行為傾向度越高。

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媒體注意、政治信任、心理距離、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關係，結果如表 4-2-4。分析結果顯示，在政策支持度方面，在控制其它變項後，風險感知可以顯著增加 7.3%的變異量（ $F=14.027, df=906, p<.001$ ），且風險感知可以負向預測政策支持（ $\beta=-0.306, p<.001$ ），意即對軍事訓練役制度風險的擔憂程度越高，越不支持軍事訓練役制度施行，因此 H4a 成立。

在對行為傾向部分，控制自變項後，加入風險感知顯著增加 3%的變異量（ $F=17.243, df=906, p<.001$ ），且風險感知能正向預測行為傾向（ $\beta=0.195, p<.001$ ），意即越是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越會改變自身服役行為及關注國防事務的程度，因此 H4b 成立。

表 4-2-4.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政策支持	行為傾向
Step1		
人口統計變項		
服役情形—尚未服役 a	.015	.039
分階段服役	-.038	.068
已完成服役	-.031	.025
年級—二年級 b	.044	.005
三年級	.051	-.019
四年級	.073*	.008
ΔR^2	.013	.009
Step2		
政黨傾向		
泛藍 c	.009	.024
泛綠	-.005	-.001
ΔR^2	.002	0
Step3		
媒體注意		
傳統媒體注意	-.14***	-.028
網路媒體注意	-.012	.101**
ΔR^2	.016**	.057***
Step4		
人際傳播		
ΔR^2	.005*	.031***
Step5		
政治信任		
ΔR^2	.037***	.092***
Step6		
心理距離		
時間性心理距離	-.093**	-.001
社會性心理距離	.042	.01
ΔR^2	.046***	.006*
Step7		
風險感知		
ΔR^2	.073***	.03***
R^2	.191***	.225***
F	14.027***	17.243***
df	906	906

註 1：對照組 a—不需服役、b—一年級、c—無特定黨派。

註 2：N = 907

*p<.05 **p<.01 ***p<.001

肆、 風險感知之中介效果分析：

進一步檢視整體回歸模型，在人口統計變項層次及政黨傾向層次對政策支持及行為傾向皆無顯著的影响力；而媒體注意層次部分，傳統媒體注意負向預測政策支持（ $\beta = -0.14, p < .01$ ），政治信任則正向影響政策支持（ $\beta = 0.164, p < .001$ ），時間性心理距離則顯著負向影響政策支持（ $\beta = -0.093, p < .01$ ）；而網路注意程度（ $\beta = .101, p < .01$ ）、人際傳播程度（ $\beta = 0.84, p < .01$ ）、政治信任（ $\beta = 0.368, p < .001$ ）亦會影響行為傾向，因此以 Sobel test 檢驗風險感知之中介效果，結果顯示，風險感知對傳統媒體注意程度和政策支持度之中介效果不顯著（ $z = 0.511, p > .05$ ），為完全中介，意即越是注意傳統媒體中有關軍事訓練役訊息，會透過增加風險感知來影響政策支持的高低；風險感知對政治信任和政策支持之中介效果不顯著（ $z = 0.873, p > .05$ ），意即政治信任會透過風險感知程度進而影響政策支持度；風險感知對時間性心理距離和政策支持有顯著中介效果（ $z = -7.792, p < .001$ ），標準化效果量 $d = -0.137$ ，意即時間性心理距離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會透過風險感知讓政策支持減少 0.137 個標準差，為部分中介，意即時間性心理距離越近，除透過風險感知影響政策支持外，亦會直接影響其政策支持程度。

在行為傾向方面，風險感知對新媒體注意與行為傾向有顯著中介效果（ $z=2.678, p<.01$ ），標準化效果量 $d=0.018$ ，意即新媒體注意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會透過風險感知讓行為傾向增加 0.018 個標準差，為部分中介，意即網路注意程度除透過風險感知增加行為傾向外，亦具有部分直接影響的效果；風險感知對人際傳播與行為傾向有顯著中介效果（ $z=2.804, p<.01$ ），標準化效果量 $d=0.019$ ，意即人際傳播程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會透過風險感知讓行為傾向增加 0.019 個標準差，為部分中介，意即人際傳播對行為傾向亦有部分直接效果；風險感知對政治信任和行為傾向之中介效果則不顯著（ $z=-0.542, p>.05$ ），為完全中介，意即政治信任越低，風險感知越高，進而影響行為改變程度越高。

第三節、自我效能調節效果分析

壹、自我效能描述性統計：

在政策支持程度方面，題項「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帶來的威脅。」的問題中，回答「有點同意」45.4%為最高、「非常同意」25.3%次之；而在「在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的問題中，回答「有點同意」47.3%為最高、

「同意」20.5%次之；「我的個人行動能夠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造成之國防安全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的問題中，回答「有點同意」45.1%為最高、「同意」20.2%次之；「改變我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支持行動，將有助於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所帶來的威脅。」的問題中，「有點同意」50.4%為最高、「同意」20.7%次之（詳見表 4-3-1.）。由上述可知，受訪者的自我效能感皆為中間偏高，且約有七成五的受訪者對認為自身有能力改變政策帶來之威脅，遠超於約二成五效能感較低的受訪者。

表 4-3-1.自我效能程度次數分配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 不同意	有點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平均值
行動 容易性	n=27 3%	n=59 6.5%	n=140 15.4%	n=412 45.4%	n=211 23.3%	n=58 6.3%	n=907 100%	3.99
行動 容易性	n=35 3.9%	n=56 6.2%	n=146 16.1%	n=429 47.3%	n=186 20.5%	n=55 6.1%	n=907 100%	3.92
行動 容易性	n=40 4.4%	n=59 6.5%	n=171 18.9%	n=409 45.1%	n=183 20.2%	n=45 5%	n=907 100%	3.85
行動 容易性	n=33 3.6%	n=42 4.6%	n=143 15.8%	n=457 50.4%	n=188 20.7%	n=44 4.9%	n=907 100%	3.94
構面 平均值	3.93							

註：n 表示個數，百分比為佔該項次有效百分比

貳、 人口統計變項與自我效能之差異性檢定：

在人口統計變項部分，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不同服役情形在自我效能構面有顯著差異（見表 4-3-2），進一步檢視其在自我效能方面之顯著差異（ $F=2.798, p<.05$ ），已完成服役（ $M=4.24, SD=1.001$ ）為最高，惟組間未達顯著水準。意即當過兵的大學生對於自己能夠做些什麼減緩風險發生的「信心」較高。

此外，年級自我效能（ $F=5.12, p<.01$ ）上有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在自我效能方面三年級學生（ $M=4.15, SD=0.838$ ）顯著大於（ $P=<.01$ ）一年級學生（ $M=3.82, SD=0.897$ ）。可知高年級受高等教育程度較長的人員相對於僅接受一年大學教育，對政府政策呈現出較高的信任與自我效能感。

由上述可知，有當過兵與沒當過兵的大學生，對軍事訓練役議題自我效能感確實存在差異；而在年級部分，較高年級與較低年級也有明顯的不同。

表 4-3-2.服役情形及年級與自我效能之差異性檢定

	服役情形				F 值	年級				F 值
	尚未服役	分階段服役	已完成服役	不需服役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自我效能	3.9	4.21	4.24	4.15	2.798*	3.82	3.94	4.15	3.9	5.12**

註*p<.05 **p<.01 ***p<.001

參、 假設驗證

H5：閱聽眾的自我效能感會調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度、行為傾向的關係。

以階層迴歸檢驗風險感知程度和自我效能對政策支持之交互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3-3，分析結果顯示，模型 2 中風險感知程度和自我效能的主效果可以解釋政策支持變異中的 13.6%， $F=71.261$, $df=906$, $p<.001$ ，而在控制了主效果後，風險感知 X 自我效能交叉相乘項，與政策支持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加 0.3%的變異，然而此效果並不顯著，因此自我效能對政策支持並不具調節效果。

表 4-3-3.風險感知與自我效能對政策支持之交互作用分析

	政策支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共線性	
	β	β	β	容忍值	VIF
Step1					
風險感知	-.367***	.376***	-.373***	.955	1.047
Step2					
自我效能		.043	.043	.597	1.045
Step3					
風險感知 X 自我效能			.058	.998	1.002
Total R ²	.134***	.136	.139		
ΔR^2		.002	.003		
F	140.542***	71.261***	48.794***		
ΔF		1.847	3.471		
N		907			

註*p<.05 **p<.01 ***p<.001

以階層迴歸檢驗風險感知程度和自我效能對行為傾向之交互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3-4，分析結果顯示，模型 2 中風險感知程度和自我效能的主效果可以解釋行為傾向變異中的 25.3%， $F=152.684$, $df=906$, $p<.001$ ，而在控制了主效果後，風險感知 X 自我效能交叉相乘項，與行為傾向的交互作用，並沒有增加變異量（ $p>.05$ ），意即自我效能對行為傾向並不具調節效果，因此 H5 不成立。

表 4-3-4.風險感知與自我效能對行為傾向之交互作用分析

	行為傾向			共線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容忍值	VIF
	β	β	β		
Step1					
風險感知	.2***	.103**	.102**	.955	1.047
Step2					
自我效能		.471***	.471***	.957	1.045
Step3					
風險感知 X 自我效能			-.015	.998	1.002
Total R ²	.04***	.253***	.25		
ΔR^2		.212***	0		
F	37.728***	152.684***	101.805***		
ΔF		256.969***	.287		
N		906			

註 * $p<.05$ ** $p<.01$ *** $p<.001$

由上可知大學生的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主要受到風險感知的驅使，自我效能並沒有顯著的調節關係，意即大學生自我效能的高低的，並不會加劇或減緩因擔憂軍事訓練役制度潛在風險所產生之政策立場與行為的改變。

最後，綜整本研究假設檢驗結果如表 5 所示，假設 1a、1c、2、3、4a、4b 皆成立，假設 1b、5 不成立。

表 5.本研究假設檢驗結果

	研究假設	結果
H1a	使用傳統媒體注意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成立
H1b	使用網路媒體注意議題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風險感知越高。	不成立
H1c	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越高。	成立
H2	政治信任程度越低，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成立
H3	心理距離越近，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	成立
H4a	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政策支持度越低。	成立
H4b	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行為傾向度越高。	成立
H5	閱聽眾的自我效能感會調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度、行為傾向的關係。	不成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網路問卷調查法，取得 907 個有效樣本，探討媒體注意程度、政治信任、心理距離對於風險感知之間的關聯性是否會影響政策支持程度與行為傾向，並探討自我效能的調節作用。研究者據此分析受測者問卷填答結果，使用迴歸分析檢視媒體關注

程度、政治信任、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的影響，再進一步檢驗受訪者透由媒體的風險判斷如何影響其面對風險的認知與行為。研究者經由分析與歸納研究結果，作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俾供政府、國軍單位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之總結與討論，第二節則為研究限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

第一節、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大學生獲取資訊媒體情形集中化

根據前列媒體注意程度及人際傳播之描述性統計，發現在軍事訓練役制度的議題上，大學生最主要透過人際取得相關訊息（ $M=4.43$ ），而網路注意（ $M=4.21$ ）次之，以下將分別說明人際傳播與媒介特性影響大學生使用的情形。

（一）人際傳播：

大學生透過人際傳播注意訊息程度平均分數（ $M=4.43$ ）高於其他四種媒體，可見此一國防政策在校園中的宣導力度、與人際間的討論程度都相當高，如同 Arlikatti 等人（2007）指出人際傳播資訊的詳細程度可能不及大眾傳播媒體，但人們似乎更相信通過人際傳播而獲得的資訊（Price and Zaller, 1993），教官具備國防相關知識，而親朋好友則是信任感較高的群體，因此有將近九

成大學生是透過學校教官與親朋好友等人際的管道注意到軍事訓練役制度的相關訊息。

（二）網路媒體注意：

依照媒體注意程度平均分數顯示，在四種媒體中受測者中最常使用網路（平均分數 4.21）作為獲取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的媒體、次之為電視（平均分數 3.66），可知大學生多以網際網路獲取訊息。Feezell 等人（2016）指出網際網路在互動性與使用功能都遠大於電視、報紙和廣播。Bimber（2014）認為網際網路為年輕人普遍使用，且可以表現個人主義並促進公民參與的實現，意即網際網路除便利性與資訊的多元性，提供了人們更多選擇的權力，更提供了使用者政治參與的場域，此與傳統單向式傳播不同，在網際網路的世界存在許多對話與選擇，因此這種「參與性文化」（Henry Jenkins, 2006）逐漸成為年輕世代資訊尋求主要管道。

二、 媒體注意程度與人際傳播會影響大學生風險感知

使用迴歸分析傳統媒體、新媒體注意程度與人際傳播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媒體注意層次中，媒體部分整體模型可以預測風險感知的程度，然而進入迴歸模型中則為傳統媒體注意（ $\beta=0.085$, $p<.05$ ），而下一階層的人際傳播（ $\beta=0.1$, $p<.01$ ），對於軍事訓

練役的風險認知亦有顯著預測力。過去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資訊管道，電視、報紙、廣播、網際網路和人際傳播，對風險感知有不同的影響（Vyncke et al., 2017），本研究在傳統媒體方面有顯著效果，意即越是注意傳統媒體上有關軍事訓練役的訊息，風險感知會隨之增高，若以多元回歸來檢驗，進入回歸模型的則為廣播媒體注意。過去 Albarran 等人（2007）指出閱聽人收聽廣播媒體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資訊與新聞，WP Mtega（2018）研究發現廣播和電視有傳播知識的潛力。研認為廣播覆蓋範圍廣泛，收聽方式較無門檻且靈活，且透過聲音傳遞及口語化的表現，就像隨時陪伴在閱聽眾身邊，如同面對面的語言形式傳遞資訊，造成閱聽眾對議題認識的加深，因而促發閱聽眾對軍事訓練役風險的認知與思考。

而在人際傳播部分有研究指出，來自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知識可能會影響資訊的傳播和交流，以及知識的獲取（Ashworth and Carley, 2006; Burt, 1992; Coleman, 1990），本研究的母體為大學男生，目前國內大學都設有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因此從教官處接觸到國防資訊的機會自然較高，以及同儕之間兵役議題交流等人際傳播程度亦較高，而通過社交網絡（Moussaïd, Brighton, & Gaissmaier, 2015）和人際傳播（Binder et al., 2011）進行的不同

類型的個人溝通過程也已經被證明會影響對風險的理解和感知。

因此在本研究的案例中，發現人際傳播程度越高，對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風險感知也越高。上述結果也符合風險社會放大框架（SARF）的概念，廣播媒體及人際傳播在本研究中傾向於將風險擴大，即為風險訊息的「放大站」。

然而其他媒體沒有顯著影響風險感知的原因，推測是由於電視新聞偏向於快速摘要式的報導，閱聽眾也可能採瀏覽式的收看，因此在事件相關背景知識或分析資料較為不足（Iyengar, 1991），因而難以促發閱聽眾思考及形成風險認知；而報紙雖提供了較為詳細的訊息，然而由於受訪者使用報紙注意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的比例不高，將近 75% 的受訪者不會使用報紙來獲取相關訊息，且目前軍事相關報導主要由青年日報、軍聞社等軍事新聞單位提供，青年日報為對國軍內部發行之報紙，一般大學生使用的機會並不大，因此樣本數小可能造成統計結果不顯著；而網際網路雖然為大學生主要注意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的管道，但由於其便利性與廣泛性，大量的訊息傳遞形成「資訊超載」

（information overload），造成大學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判斷，抑或收集更多的資訊以求其真假，此一過程對大學生而言，也許更不利評估風險。

綜上所述，不同性質的媒介傳播確實會造成閱聽眾認知的差異，建議政府及國防部可以針對媒介特性，有計劃的進行政策宣導，單向式傳播媒介需注意資訊的詳實與可靠性，而針對網際網路的部分，則用以進行風險溝通與真假資訊的澄清，以免因為不實錯誤的訊息造成即將起役或服現役人員的不安。

三、 政治信任會影響大學生風險感知之程度

在本研究中，大學男生的政治信任程度為中間偏向認同（平均分數 3.95）。Griffin 等人（2004）認為政府作為一種機構，對政治信任是相信政府有能力防止個人遇到潛在風險，且政府有責任向公眾傳遞社會風險資訊並應對威脅（Ju, Lim, Shim, & You, 2015），因此對政府高度信任的個人可能會認為政府有足夠的能力和知識來處理危機（Choi et al., 2018）。陳憶寧（2014）在核能風險研究發現，政治信任程度愈低，愈是認為核能風險重要性高。而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政治信任對風險感知的關係，結果顯示政治信任會負向影響風險感知程度（ $\beta = -0.125, p < .01$ ），與該研究結果相符，意即越是不相信政府軍事訓練役制度推行方面有公開資訊且應對風險的能力，大學生對國防戰力受損風險的感知便會提高；相反的，對政府政策越是抱持信任的態度的大學生，風險感知亦會降低。因此建議政府推動兵役制度轉型，除了政策

資訊要更透明化之外，更需讓即將起役，或已經退役的人員了解政策之優缺點衡量，並或提供客觀的研究數據做為參考，以提升對於國家政策與政府之信任，降低對於兵役轉型的疑慮與擔憂。

四、心理距離會影響大學生風險感知

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發現大學生心理距離與風險感知有顯著正向預測力 ($F=24.841, df=906, p<.001$)，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相符，意即心理距離感知越近，大學生的風險感知程度越高，本研究討論心理距離時，援引 Bar-Anan 和 Trope (2006) 的 CLT 理論中時間性及社會性兩個維度，以多元迴歸模型檢驗，其中僅有時間性心理距離有顯著正向預測力 ($\beta=.411, p<.001$)，亦即在時間上心理感知越接近，風險感知的程度越高，此與解釋水平理論 (Trope & Liberman, 2010) 的含義一致，當大學生感知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影響越迫在眉睫，越擔心它可能帶來的風險，反之，若覺得在未來幾年內都不太可能感覺到影響的大學生，則對風險感到更低程度的擔憂。

而在社會性心理距離方面則沒有顯著影響 ($\beta=.049, p>.05$)，根據 Trope 與 Liberman (2010) 對社會性心理距離的定義，為某件事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或是發生在與自己相似的人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本研究從樣本的性質來看，大

學男生都是即將起役、正在服役，甚至已經完成服役，群體之間的相似性高，兵役政策本身便與這個年齡層的男性最為相關，因此本研究推論由於樣本的同質性高，且樣本的回答多落在平均值左右（平均分數 4.02），因而造成統計結果的不顯著。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的影響，雖然沒有客觀的數據支持這樣的質疑，但由於 108 年起義務役正式轉向軍事訓練役，現階段仍是我國現役及後備兵員的最主要來源，因此該政策的影響在時間感受上較近，亦影響大學生的風險感知。事件能夠透過訊息結構賦予意義，在本研究中為時間性心理距離有顯著相關，建議政府在進行政策溝通時，能夠利用時間的框架提供思考脈絡，給予民眾更多信心並降低對政府政策的擔憂。

五、 風險感知會影響閱聽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

研究使用多元迴歸分析發現大學生風險感知會負向預測政策支持（ $\beta = -0.304, p < .001$ ），並正向預測行為傾向（ $\beta = 0.197, p < .001$ ）。在政策支持方面，梁世武（2014）研究發現風險認知對政策支持有良好的解釋力，傅文成、陳靜君（2017）研究亦發現風險感知越高，越不支持募兵制的實行，與本研究之結果一致，風險感知為預測政策支持最具解釋力的因素，而受訪者

認為軍事訓練役帶風險感知越高，對政策也採取較不支持的態度；在行為傾向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存在正向的關係，意即對軍事訓練役風險感知越高，在服役、關注國防事務等行為上越有可能改變，在同樣探討風險的議題上，本研究與徐美苓（2019）空汙風險感知研究發現相同，空汙威脅感知會正向影響受訪者對空汙的防制行為意向。本研究認為民眾在服役行為上會受風險感知程度影響，係由於役期縮短、不需下部隊等客觀因素，因此認為自身有義務維護國防安全的責任、成為國防安定力量的一份子，而產生其服役行為上的改變。

六、 自我效能不會調節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之關係

Baron 和 Kenny（1986）表明一個構面到另一個構面之間的關係，受其他構面影響，稱為調節效果（moderation effect）。意即當自變項會在不同的情境或條件下，對依變項存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時。本研究在檢視自我效能的調節作用時，發現該變項對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的調作用並不顯著，說明了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行為傾向的直接影響關係並不會因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而有差異，本研究推論由於自我效能是對自身是否能完成一件事的「信念」，因此為直接預測行為傾向的重要變數

(Hendriksen et al., 2007 ; Devarajoooh & Chinna, 2017)，過去研究發現，在風險訊息中提供因應策略的提示能夠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施琮仁 (2017) 在研究氣候變遷風險中發現，若民眾知道面對氣候變遷有何行為參考，因而形成不同的效能感，會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其中由政府提人民作為應為風險的個人作為，可視為一種行為提示，例如隨手關燈等促進節能減碳的行動。然而本研究在測量自我效能感時，考量兵役制度轉型的議題屬性中並無明確的行為提示，因此受訪者在沒有接收提示的狀況下，可能無法形成具體的應對行為，意即並不明確的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來減緩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之風險，因此受訪者回答均落在平均值左右 (平均分數 3.93)，而造成統計結果不顯著。由於國防政策議題的特殊性，政府能提供的行為提示亦有限制，建議將來在國防施政，持續強化全民國防的理念，落實全民關注、全民支持與全民參與的文宣作為，並嘗試說服民眾訊息中策略行動能有效減緩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的負面影響，來建立民眾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使民眾除了議題重要認知提升之外，亦能產生服役行為及關注國防的改變。

七、 人口統計變項及其他影響

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人口統計變項在各個構面的差異，發現有當過兵與沒當過兵確實有差別，已完成服役的人在政治信任及自我效能為明顯高於其他，本研究認為親身參與過軍事訓練，對戰力如何形成概念較具體化，因此對於政府推行軍事訓練役政策認同感較高，也較為認同軍事文化、認為自己為國防力量的一份子，因此亦展現出較高的自我效能；而不需服役的人員在風險感知與時間性心理距離高於他者，本研究推論是由於不需服役的人員，並沒有機會接觸軍事訓練，因此對於部隊戰力認識不深，進而造成更大的擔憂，且認為該政策帶來的可能影響更是當務之急。此外，高年級亦表現出較高的政治信任與自我效能，其中以三年級顯著高於其他，本研究推論其原因為國防事務認識的程度，目前我國大專院校皆設有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對兵役制度、國防現況較為了解，因此對政策信任程度也較高，且自我效能也因為對議題的了解而對自己更有信心。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調查了與軍事訓練役最有相關的群體，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看法，研究結果証實了媒體、政治信任與心理距離的影響力，也証實了風險感知是預測政策支持與行為傾向的重要變數，提供政府在媒體運用、訊息傳播策略的參考，針對風險議題在初

始階段的訊息管理與溝通，已達後續風險管理之目的。然而研究本身的限制性與未來可行性仍有待拓展，以下將就研究過程之限制與未來方向進行探討。

在理論方面，本研究發現自變項中，時間性心理距離為預測風險感知最重要的變數，建議後續研究能更深入探討心理距離認知的成因，例如其與資訊接收管道與媒體注意程度的之關聯性；此外，雖然過去學者已發現效能感對增強行為有所幫助，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卻指出，自我效能感對風險感知與行為並無調節關係，可知自我效能的形成與後果，有待更進一步地檢視，未來探究自我效能的成因亦是風險研究重要的一環。

在實務方面，第一為調查執行與樣本限制，因人力、時間、經費、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限制，本研究係以網路問卷調查法，採分層叢集抽樣針對台北市大學男生進行調查，因此樣本比例仍難以完全吻合我國大學男性的人口結構。建議後續之研究設計更嚴謹的抽樣架構，以提升外在效度。此外，除問卷調查法外，建議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以充實研究結果，如焦點團體訪談等，用以搜集大學生除意見性以外之具體建議，以描繪政策改革的輪廓與可行性。

第二是研究變項限制，根據過去研究，許多因素均會對於風險感知有所影響，像是個人風險知識（陳憶寧，2014；傅文成、陳靜君，2017）以及議題的涉入程度（黃逸宏，2019；傅文成，2019）等，然本研究僅針對媒體關注程度、人際傳播、政治信任、心理距離等三個因素作為自變項進行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在許可情況下，加入更多可能產生影響的變項進行研究，增加研究的貢獻與其結果的豐富程度，能提供政府未來在風險溝通與政策推行方面更有效的方向。

第三則是問卷設計限制，本研究係以「網路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在問卷設計仍有缺陷，如政治信任程度若非以針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信任，而是以對政府整體客觀的信任感來測量，也許能更清楚政治信任與風險之間的關係，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在問卷的修訂尚須更加嚴謹。此外，心理距離僅使用了時間性與社會性兩個維度，建議後續研究能將地理性與不確定性一並納入探討，並以「框架」的觀點來釐清不同的距離感知對風險認知形成的差異，以擴展研究結果。在效能感的部分，本研究探討僅探討自我效能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針對政策的特性，發展回應效能及集體效能構面作為變數之一，過去已有研究證實其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施琮仁，2017），且過去研究多聚焦在效能感對行為的

影響，若能檢驗影響效能感的因素，亦能提供政府在傳遞政策與風險溝通更具體的作為。

最後，本研究係以橫斷面的問卷調查測量大學男生的態度，軍事訓練役政策的實施自 102 年便開始，108 年義務役即全面改行軍事訓練役制度，研究者建議若能採取時序性的調查，更能看出隨時間推移受訪者在態度上的變化，抑或利用大數據資料分析方式來檢視態度變化的關鍵因素，以提供政府針對政策處理與風險管理更具體之方向。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Andrew Maxey & Allen Chen (2019.09.09) 台灣義務役四個月會

太短嗎？比較新加坡、芬蘭與南韓的訓練期。關鍵評論網。

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24 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8023>

中華民國國防部 (2017) 。《 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 》。台

北：國防部。

中華民國國防部新聞稿 (2017.12.19) 。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74954&title=%E5%9C%8B%E9%98%B2%E6%B6%88%E6%81%AF&SelectStyle=%E6%96%B0%E8%81%9E%E7%A8%BF>

中華民國國防部新聞稿 (2019.07.08) 。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76377&title=%E5%9C%8B%E9%98%B2%E6%B6%88%E6%81%AF&SelectStyle=%E6%96%B0%E8%81%9E%E7%A8%BF>

內政部役政署 (2019.10.22) 。役男服役須知。上網日期：2019

年10月22日。取自：

https://www.nca.gov.tw/chaspx/Faq_Detail.aspx?web=84&id=25

9

王榮慶（2016）。〈我國當前兵役制度精進之探討「徵、募併行制」一相輔相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16。1-102。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04.17）。兵役法第16條。上網日期：

2019年10月7日，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F0040001&flno=16>

吳定（2006）。《公共政策辭典》，頁407。台北：五南。

呂欣懋（2019）。役男4個月軍事訓練 107年起不用下部隊。中

今日新聞。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219/2664946/>

李宛庭（2018）。〈兩岸軍事新聞報導對國軍官兵戰爭風險感知與行為傾向之研究—以中共軍機繞台為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論文。

李明穎（2014）。〈科學民主化下科技議題的風險治理：探討國光石化廠開發案的科技官僚風險溝通、公眾風險感知與公眾動員〉。《思與言》，52（4）：111-159。

周桂田（2003）。〈全球在地化風險下之風險溝通與風險評估—以 SARS 為 Case 分析〉，「2003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論文。台灣，台北。

周桂田（2004）。〈獨大的科學理性與隱沒（默）的社會理性之「對話」—在地公眾、科學專家與國家的風險文化探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6，1-63。

周桂田、張淳美（2006）。〈遲滯型高科技風險社會下之典範鬥爭—以換發身分證按捺指紋案為分析〉。《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7：127-215。

林天生，楊潔（2013）。〈基於公眾政府信任度的溫室氣體風險感知研究〉。《安全與環境學報》，13（5）：146-149

邱玉蟬、游絲涵（2016）。〈食品安全事件的風險建構與溝通：新聞媒體 VS. 政府〉。《中華傳播學刊》，30：179-220。

施琮仁（2015）。〈不同媒體平臺對公眾參與科學決策能力之影響：以奈米科技為例 =Media and Public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Using Nanotechnology as a Case Study〉。《新聞學研究》，124：165-213

施琮仁（2017）。〈以公眾認知為中心的氣候變遷風險溝通：理論與實踐〉，《傳播文化》，16（1）：4-41。

施琮仁（2017）。〈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包裝與呈現對

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影響〉，《傳播研究與實踐》，7

（1）：5-36。

洪哲政（2019.12.17）。義務役不落日 國防部：軍事訓練役就是

徵兵義務役。聯合新聞網。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

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541256>

洪錦成、施奕暉（2013）。〈我國兵役制度的演進、變革與展

望〉。《檔案季刊》，12（2）：30-45。

紀淑芳（2019.10.23）。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美籲建置有戰力後備

兵力。中央社。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0090136.aspx>

徐美苓、楊意菁（2011）。〈台灣全球暖化風險溝通的公眾認

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15 期，頁 71-104。

涂鉅旻（2019.01.22）。兵役制度檢討》南韓 以色列 徵兵逾 60

年。自由時報電子報。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24 日。取

自：<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263136>

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2014.01.22）志願役士兵招募員額依國

軍實需兵力訂定。上網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ilitarySpokesman/posts/648255541904434>

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業（2019.07.08）募徵併行兵役制度執行順

利，請國人多多支持唷。上網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取

自：

<https://www.facebook.com/MilitarySpokesman/posts/247289158610747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6 年通訊市場調查結果摘要報告〉，

上網日期：109 年 2 月 4 日，取自：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8030/3923_38847_180301_3.pdf

國發會。〈107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上網日期：108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85YWJhOGUwYy00MjE0LTRmMDUtYmYyYi0wMDBiYTU4MTM0YTUucGRm&n=MTA35bm05YCL5Lq65a625oi25pW45L2N5qmf5pyD6Kq%2f5p%2bl5aCx5ZGKLnBkZg%3d%3d&icon=.pdf>

陳定海（2004）。〈專家意見在我國核能政策風險認知之角色研

究〉，臺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陳憶寧（2011）。〈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危機中的媒介使用、政治信任與風險感知的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17：31-60。

陳憶寧（2014）。〈福島危機中台灣民眾對核能的風險感知與態度:政黨傾向、核能知識、信任與科學傳播的角色〉。《傳播與社會學刊》，26：223-265。

傅文成（2018）。〈兩岸服貿協議民眾的媒體信任、政治信任、風險感知與行為意圖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34：167-206。

傅文成、陳靜君（2017）。〈募兵政策之媒體議題的媒體信任感與民眾風險感知與媒介使用關聯性研究〉。《復興崗學報》，110：25-55。

黃清賢（1996）。《危害分析與風險評估》，台北：三民書局。

黃逸宏（2019）。〈國軍志願役軍士官對年金改革風險感知與留營意願之影響〉。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論文。

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三次（2014）:媒體的娛樂與社交功能〉，上網日期：108年5月1日，取自
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AnnualSurvey_detail.asp?ASD_ID=20

楊意菁 (2012) 。〈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溝通:以全球暖化議題的情

境公眾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22：169-209。

編輯中心 (2019.01.23) 。因應對岸威脅你贊成恢復徵兵制嗎？

網友投票近八成支持。今日新聞。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123/3191271/>

蔡明峯 (2016) 。〈台灣民眾對食品安全衛生之風險感知、社會

信任與個人避險行為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

立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宜蘭縣。

鄭玄輝 (2017.10.10) 。自由廣場《軍事訓練役惡整作戰部隊。

自由電子報。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2432>.

蘇仲泓 (2019.10.09) 。美方憂我「軍訓役 4 個月」役期太短 國

防部回應了。風傳媒。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

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1808137>.

顧傳型 (1988) 。《兵役理論於實務》，頁 1。台北：三民。

二、英文部分

Albarran, A. B., Anderson, T., Bejar, L. G., Bussart, A. L., Daggett, E., Gibson, S., & Way, H. (2007). What happened to our audience? Radio and new technology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 among young adult users. *Journal of Radio Studies*, 14(2), 92-101.
- Arlikatti, S., M.K. Lindell, & C.S. Prater. (2007). Perceived stakeholder role relationships and adoption of seismic hazard adjust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5, 218-256
- Ashworth, M. J., & Carley, K. M. (2006). Who You Know vs. What You Know: The Impact of Social Position and Knowledge on Team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30(1), 43–75.
- Aven, T. (2003). Foundations of risk analysis: *A knowledge and decision-oriented perspective*. New York: Wiley.
- Baldwin, A. S., Rothman, A. J., Hertel, A. W., Linde, J. A., Jeffery, R. W., Finch, E. A., & Lando, H. A. (2006). Specif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initi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ehavior change: An examination of self-efficacy, satisfaction, and smoking cess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5, 626–634.
- Bandura, A.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122-147. [A classic article published in APA's flagship journal]
- Bandura, A. (1997). Personal efficacy in psychobiologic functioning. In G. V. Caprara (Ed.), *Bandura: A leader in psychology* (pp. 43-66). Milan, Italy: Franco Angeli.
- Bandura, A. (2001). The changing face of psychology at the dawning of a globalization era, *Canadian Psychology*, 42, 12-24.

- Bandura, A. (2004). Come cambia l'educatione nell'era dell'informatica (The changing face of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era). *Nuove Tendenze della Psicologia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logy)*, 2, 151-158.
- Bandura, A. (2006). Adolescent development from an agentic perspective. In F. Pajares & T. Urdan (Eds.). *Self-efficacy beliefs of adolescents*, (Vol. 5., pp. 1-43).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Bar-Anan Y, Liberman N, Trope Y, Algom, D.(2007)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Evidence from a Stroop tas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4):610–622.
- Bar-Anan Y, Liberman N, Trope Y.(200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level: Evidence from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5(4):609–622.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Bimber, B. (2014). Digital Media in the Obama Campaigns of 2008 and 2012: Adaptation to the Personaliz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1(2), 130–150.

- Binder AR, Scheufele DA, Brossard D, Gunther AC. (2011)
Interperson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itizen discuss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erceptions of risks and benefits of a biological
research facility. *Risk Analysis*; 31(2):324–334.
- Bostrom, A., Hayes, A. L., & Crosman, K. M. (2018). *Efficacy,
Action, and Support for Reducing Climate Change Risks. Risk
Analysis*.
- Bourassa, M. W., Alim, I., Bultman, S. J., Ratan, R. R. (2016).
Butyrate, neuroepigenetics and the gut microbiome: Can a high
fiber diet improve brain health? *Neurosci Lett.* 625, 56-63.
- Brody S D; Zahran S; Vedlitz A & Grover H (2008)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Vulnerability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40 (1):
71-95
- Brody, A., Demetriades, J., and Esplen, E (2008)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Mapping the Linkages - A Scoping Study on
Knowledge and Gap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Brody, S., Grover, H., & Vedlitz, A. (2012). Examining the
Willingness of Americans to Alter Behavior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Climate Policy*, 12(1), 1-22.
- Brucks, M. (1985) The Effects of Product Class Knowledge 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
16.

- Brügger, A, Morton, TA and Rauto Dessai, S (2016) "*Proximising*" *Climate Change Reconsidered: A Construal Level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6. pp. 125-142.
- Bubeck, P., W.J.W. Botzen, and J.C.J.H. Aerts (2012) 'A review of risk perception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flood mitigation behavior'. *Risk Analysis*. 32(9). pp. 1481–1495
- Burt, S.R.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ston, MA.
- Cacciatore, M. A., Scheufele, D. A., & Corley, E. A. (2012). Another (methodological) look at knowledge gaps and the Internet's potential for closing the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0(0), 1-19.
- Campbell, S. (2005). Determining overall risk.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8: 569–81.
- Chaffee, S. H., & Schleuder, J. (1986).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of attention to media new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1), 76-107.
- Chandran S, Menon G. (2004). When a day means more than a year: Effects of temporal framing on judgements of healt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2):375–389.
- Chanley, V. A. (2002).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9/11: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3(3), 469–483.

- Chen, W. P. (2013).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on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food safe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nsumers in Beijing Municipality,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view*, 5(1), 43–65.
- Citrin, J., & Muste, C. (1999). Trust in government.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Vol. 2.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p. 465-532). San Diego, CA, US: Academic Press.
- Cobb, M. D., & Macoubrie, J. (2004). *Public perceptions about nanotechnology: Risks, benefits and trust. 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 6(4), 395–405.
- Coleman, J. S. (1990). Rational Organiza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1), 94–105.
- Coleman C-L.(1993). The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societal and personal risk judgmen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4):611–628.
- Combs, B. and Slovic, P. (1979) Newspaper coverage of causes of death. *Journalism Quarterly*, 56, 837-849.
- Dart, J. (2014). New media, professional sport and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38(6), 528-547.
- Deng, Z., & Liu, S. (2017). Understanding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sk perception attitude framework and social support in mobile social media web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105, 98–109.

- Deutsch, M. (1958). Trust and suspic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265–279.
- Devarajoo, C., & Chinna, K. (2017). Depression, distress and self-efficacy: The impact on diabetes self-care practices. *PloS One*, 12(3), e0175096.
- DiClemente, C. C., Fairhurst, S. K., & Piotrowski, N. A. (1995). Self-efficacy and addictive behaviors. In J. E. Maddux & J. E. Maddux (Eds.), *Self-efficacy, adaptation, and adjust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p. 109–141).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Dijkstra, A., & Vries, H. D. (2000). Self-efficacy expectations with regard to different tasks in smoking cessation. *Psychology & Health*, 15, 501–511.
- Dixon, H., Scully, M., Wakefield, M., & Murphy, M. (2008). The prostate cancer screening debate: public reaction to medical controversy in the medi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1), 115–128.
- Douglas, M. & Wildavsky, A. (1982). *Risk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owning, P. E., Jiang, Y., Shuman, M., & Kanwisher, N. (2001). A cortical area selective for visual processing of the human body. *Science*, 293(5539), 2470-3.

- Durant, J., Bauer, M.W., and Gaskell, G. (1998). *Biotechnology in the public sphere: A European sourcebook*. London: Science Museum.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uropeans and Nuclear Safety Report”, *Special EUROBAROMETER 324*, Brussels,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energy/nuclear/safety/doc/2010_eurobarometer_safety.pdf (accessed 2 January 2015).
- Eveland, W. P., & Dunwoody, S. (2001). User control and structural isomorphism or dis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 load? Learning from the Web versus pri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1), 48–78.
- Feezell, J. T., Conroy, M., & Guerrero, M. (2016).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ngaging citizenship norms through online activit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3(2), 95–107.
- Feng, N., Wang, H. J., & Li, M. (2014). A security risk analysis model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Causal relationships of risk factors and vulnerability propagation analysis. *Information Sciences*, 256, 57–73.
- Fox, J., McKnight, J., Sun, Y., Battelle, D. M., & Crawfis, R. (2019). Using a Serious Game to Communicate Risk and Minimiz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01320.

- Frewer, L., Shepherd, R. and Sparks, P. (1994), ``Biotechnology and food production: knowledge and perceived risk", *British Food Journal*, Vol. 96 No. 9, pp. 26-32.
- Geosci. Aust. (2014). What is Risk? Geosci. Aust., Symonston, Aust.
<http://www.ga.gov.au/scientifictopics/hazards/risk-impact/risk>
- Godber, A. (2005a) Urban Floodplain Land-use – Acceptable Risk? A Case Study of Flood Risk Perception on the Guragunbah (Carrara–Merrimac) Floodplain, Gold Coast.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ervices,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risbane.
- Godber, A. (2005b) ‘Urban floodplain land-use: acceptable risk?’.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20(3). pp. 22–26.
- Graham, J.D., and J.B. Weiner, eds. (1995). *Risk versus risk: Tradeoffs in protecting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enberg, M. and Truelove, H. (2010), “Right answers and right-wrong answer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fluencing knowledge of nuclear-related information”,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Vol. 44 No. 3, pp. 130-140.
- Griffin AS, West SA & Buckling A (2004)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pathogenic bacteria. *Nature* 430: 1024–1027.
- Guillard, M., Navarro, O., & Fleury-Bahi, G. (2019). Flooding experience and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lication of

- psychological distance, risk percep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Psychecology.
- Gwaltney, C. J., Metrik, J., Kahler, C. W., & Shiffman, S. (2009).
Self-efficacy and smoking cess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3(1), 56–66.
- Hackenbracht, J., & Gasper, K. (2013). *I'm all ears: The need to
belong motivates listening to emotional disclos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5), 915–921.
- Hansson, S.O. (2002) “Replacing the No Effect Level (NOEL) with
Bounded Effect Levels (OBEL and LEBEL).” *Statistics in
Medicine* 21: 3071-3078.
- Heath, Y., & Gifford, R. (2006). Free-market id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case of belief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8, 48–71.
- Heng, Y.-K.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Debat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Ulrich Beck’s World Risk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 69–91.
- Hendriksen, E.S., Pettifor, A., Lee, S.-J., Coates, T.J., & Rees, H.V.
(2007). Predictors of Condom Use Among Young Adults in
South Africa: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HIV Research Unit
National Youth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7,
1241-1248.
- Henrich, L., J. McClure, and M. Crozier (2015) ‘Effects of risk
framing on earthquake risk perception: life-time frequencies

- enhance recognition of the ris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3 (September). pp. 145–150.
- Hsu, M.-L., & Shih, T.-J. (2014, August). Pattern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mong Taiwanese adults: A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vidence, RI.*
- ISO (Int. Stan. Organ.). (2009). ISO 31000—*Risk Management*. Geneva: ISO.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iso31000.htm>
- I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effres, L. W. (1997). Mass media effects.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Jenkins, H. (2006a).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R. (2014, April 10). Taiwan's sunflower protesters end parliament blockade with fighting wor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p. N.PAG. .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4/0410/Taiwan-s-sunflower-protesters-end-parliament-blockade-with-fighting-words-video>
- Ju, Y., J. Lim, M. Shim, and M. You. (2015). Outrage Factors in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s of Food Risk and Their Influence on

News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 879–887.

Kaplan, S. (1991).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In *Risk management: Expanding horizons in nuclear power and other industries*. Boston, MA: Hemisphere Publ. Corp.

Kaplan, S., and B.J. Garrick. (1981). On the quantitative definition of risk. *Risk Analysis* Vol. 1, pp. 11–27.

Kasperson JX, Kasperson R, Pidgeon NF, Slovic P.(2003)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ssessing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and theory. Pp. 13–46 in Pidgeon NF, Kasperson RK, Slovic P (eds).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sperson, J.X., Kasperson, R.E., Turner II, B.L., Schiller, A., Hsieh, W.-H., (2003)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Diekmann, A., Dietz, T., Jaeger, C., Rosa, E.S. (Eds.),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MIT, Cambridge, MA.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 Ratick, S.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77-187.

Kasperson, R., N. Jhaveri and J. X. Kasperson. (2001) ‘Stigma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2001 : Toward a framework of

- analysis' in J. Flynn, P. Slovic and H. Kunreuther (eds.):
Risk, media and stigma. London, Earthscan: 9-27.
- Kellens, W., Terpstra, T., & De Maeyer, P. (2012).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lood Risk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Risk Analysis, 33(1), 24–49.*
- Kim, J. N, Lan, N., & Lee, Eun-Ju. (2008). Classifying public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blem-solving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ference Paper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42.
- Klerck, D., & Sweeney, J. C. (2007).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types on consumer perceived risk and adop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4(2), 171–193.*
- Krosnick JA, Holbrook AL, Visser PS. (2006). Optimizing brief assessments in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self-report measurement. In: *Carstensen LL, Hartel CR, editors. When I'm 6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p. 231.
- Lee, C.-J., Scheufele, D. A., & Lewenstein, B. V. (2005).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7(2), 240–267.*
- Lewis, R. E. , & Tyshenko, M. G. . (2009). The impac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and the public research to mad cow disease in Canada. *Risk Analysis, 29(5), 714– 728.*
- Liberman N, Trope Y.(2008) The psychology of transcending the here and now. *Science, 322:1201–1205.*

- Lichtenberg, J., & MacLean, D. (1991).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Kasperson & P. 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ng risks to the public* (pp. 157-173).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 Lowrance, W. (1976). *Of acceptable risk – scienc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safety*. Los Altos, CA: William Kaufmann Inc.
- Malka, A., Krosnick, J., Langer, G., 2009. The association of knowledge with concern about global warming: trusted information sources shape public thinking. *Risk Anal.* 29, 633–647.
- McBeth, M.K. and Oakes, A.S. (1996), “Citizen perceptions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moving radiological waste”, *Risk Analysis*, Vol. 16 No. 3, pp. 421-427.
- McComas, K. A. (2006). Defining Moments in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2005.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1), 75–91.
- McCombs, M. E. (in press). *Setting the agenda: 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Cambridge, UK: Blackwell Polity Press.
- Meissner, W., Dohrn, B., & Reinhart, K. (2003). Enteral naloxone reduces gastric tube reflux and frequency of pneumonia in critical care patients during opioid analgesia. *Critical Care Medicine*, 31(3), 776–780.
- Mileti, D.S. and J.H. Sorensen (1990) *Communication of Emergency Public Warnings: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and State-of-the-*

- Art Assessmen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Washington, DC.
- Mileti, D.S. and P.W. O'Brien (1992) 'Warnings during disaster: normalizing communicated risk'. *Social Problems*. 39(1). pp. 40– 57.
- Moorman, C., & Matulich, E. (1993). A model of consumers'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s: The role of health motivation and health abi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 208–228.
- Moorman, C., Diehl, K., Brinberg, D., & Kidwell, B. (2003). Subjective Knowledge, Search Locations, and Consumer Choic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
- Morgan, M. G. and Henrion, M. (1990) *Uncertainty: A Guide to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in Quantitative Risk and Policy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2.
- Morton, T. A., & Duck, J. M. (2001).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Belief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5), 602–626.
- Moussaïd, M., Brighton, H., & Gaissmaier, W. (2015). The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experimental diffusion cha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8), 5631–5636
- Mtega, Wulystan Pius.(2018) The Usag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s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ources: The Case of Farmers in Morogoro Region of Tanzan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v14 n3 p252-266 2018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Naumov, V. (2014). Social activ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and new media: The case of the tent camp protest action in Minsk, 2006.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3(187), 291-315.
- Nelissen, V., Saha, B.K., Ruyschaert, G., Boeckx, P. (2014a). Effect of different biochar and fertilizer types on N₂O and NO emissions. *Soil Biol. Biochem.* 70, 244–255.
- Nellis AM, Savage J.(2012) Does watching the news affect fear of terrorism? The importance of media exposure on terrorism fear. *Crime & Delinquency*, 58(5):748–768.
- Nonoyama, M., Tsurugi, Y., Shirai, C., Ishikawa, Y., & Horiguchi, M. (2005). Influence of sex-related information for STD preven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6(5), 442–445.
- O'Connor, R. E., Bord, R. J., & Fisher, A. (1999). Risk perceptions, general environmental beliefs, and willingnes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Risk Analysis*, 19, 461-471.
- Ockwell, D., Rydin, Y.(2006)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f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adoption of pro-burning knowledge claims in Cape York Peninsula, Australia*. Env. Polit
- Petroleum, petrochemical and natural gas industries - Production assurance and reliability management (ISO 20815:2018)
- Poortinga W, Pidgeon NF.(2003). Explor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trust in risk regulation. *Risk Analysis*, 2003; 23:961–972.

- Price, V., & Zaller, J. (1993). Who gets the news?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ews recep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2), 133–164.
- Priest, S. (2001). Misplaced faith: Communication variables as predictors of encouragement for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cience Communication*, 23(2), 97–110.
- Random House (1966)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tein, J. (ed.), Random House, New York.
- Risk management: Expanding horizons in nuclear power and other industries, 11–28.
- Rosa, E.A. (1998).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post-normal risk.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1), 15-44.
- Shi, J., Visschers, V. H. M., Siegrist, M., & Arvai, J. (2016). Knowledge as a driver of public perceptions about climate change reassessed. *Nature Climate Change*, 6(8), 759–762.
- Silver RC, Holman EA, Andersen JP, Poulin M, McIntosh DN, Gil-Rivas V. (2013) Mental- and physical-health effects of acute exposure to media images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and the Iraq Wa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9):1623–1634.
- Sjöberg L (2004) *Explaining individual risk perception: the case of nuclear waste*. *Risk Manag Int J* 6:51–64
- Sjöberg L. 2000. Factors in Risk Perception. *Risk Analysis*, Vol. 20, No. 1, pp.1-11

- Slovic, P. (1992). Perception of risk: Reflections on 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 In S. Krimsky & D. Golding (Eds.),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pp. 117-152). New York: Praeger.
- Slovic, P. (1993). Perceived Risk, Trust, and Democracy. *Risk Analysis*, 13(6), 675–682.
- Slovic, P. (1999). Trust, emotion, sex, politics, and science: 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 (Reprinted from Environment, ethics, and behavior , pp. 277–313, 1997), *Risk Analysis* ,19 (4), 689–701.
- Slovic, P. (ed.) (2000).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Earthscan.
- Slovic, P., Finucane, M. L., Peters, E., & MacGregor, D. G. (2004). Risk as analysis and risk as feelings: Some thoughts about affect, reason, risk, and rationality. *Risk Analysis*, 24 (2), 311–322.
- So, J. (2012). Uses, Gratifications, and Beyond: Toward a Model of Motivated Media Exposure and Its Effects on Risk Percep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2(2), 116–137.
- Søndergaard, H.A., Grunert, K.G. and Scholderer, J. (2005) Consumer Attitudes to Enzymes in Food Production.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16, 466-474.
- Ter Huurne, E. F. J., Griffin, R. J., & Gutteling, J. M. (2009).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mong U.S. and Dutch Residen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1(2), 215–237.
- Tewksbury, D., & Althaus, S. L. (2000).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readers of the paper and online versions of a

- national newspape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 457-479. Review, (187), 291-315.
- Thepaksorn, P., Siriwong, W., Neitzel, R. L., Somrongthong, R., & Techasrivichien, T. (2018). Relationship Between Noise-Related Risk Perception, Knowledge, and the Use of Hearing Protection Devices Among Para Rubber Wood Sawmill Workers.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9(1), 25–29.
- Tobler, C., Visschers, V.H.M., & Siegrist, M. (2012).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act and to support policy measur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3), 197-207.
- Trope Y, Liberman N, Wakslak C. (2007) Construal levels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Effects on representation, predic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7(2):83–95.
- Trope, Y., & Liberman, N. (2003). *Temporal constru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3), 403–421.
- Trope, Y., & Liberman, N. (2010).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2), 440–463.
- Truelove, H. B., & Parks, C. D. (2012). Perceptions of behaviors that cause and mitigate global warm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246-259.
- Trumbo CW.(1995). Examining psychometrics and polarization in a single-risk case study. *Risk Analysis*; 16(3):429– 438.

- Vainio A, Makiniemi JP, Paloniemi R. (2014).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food risk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7:510–524.
- Vyncke B, Perko T, Van Gorp B (2017) Information source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the belgian health-related risk perception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Risk Anal* 37:570–582.
- Vignoles, V. L., Chryssochoou, X., & Breakwell, G. M. (2000). The distinctiveness principle: Identity, meaning, and the bounds of cultural rel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4), 337-354.
- Vischers VHM, Keller C, Siegrist M.(2011). Climate change benefits and energy supply benefits as determinants of acceptance of nuclear power stations: Investigating an explanatory model. *Energy Policy*, 39:3621–3629.
- Vlek, C. and P. J. Stallen. (1981). “Judging risks and benefits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28: 235-271.
- Wang, S., Leviston, Z., Hurlstone, M., Lawrence, C., & Walker, I. (2018). Emotions predict policy support: Why it matters how people feel about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0, 25–40.
- Wanta, W., & Ghanem, S. (2007). *Effects of agenda setting*. In R. W. Preiss, B. M. Gayle, N. Burrell, M. Allen & J. Bryant (Eds.),

- Mass media effects research: Advances through meta-analysis (pp. 37–51). Mahwah, NJ: Erlbaum.
- Weaver, D., McCombs, M., & Shaw, D. L. (2004). Agenda-setting research: Issues, attributes, and influences. In L. L. Kaid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257–282). Mahwah, NJ: Erlbau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1), 48-78
- Willis, H.H. 2007. Guiding resource allocations based on terrorism risk. *Risk Analysis* 27: 597–606.
- Witte, K. (1992).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9, 329-349.
- World Bank. (201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 Risk and Opportunity—Managing Risk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6092>
- Yang, C., Dillard, J. P., & Li, R. (2018). Understanding Fear of Zika: 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Media Influences. *Risk Analysis*.
- Zhu, W., Wei, J., & Zhao, D. (2016). Anti-nuclear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e role of perceived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isk perception. *Energy Policy*, 88, 168–177.

附錄

軍事訓練役制度問卷調查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一份問卷，本問卷目的是在探討您對軍事訓練役制度的看法。問卷採匿名的方式，而且您在問卷中所提供的資訊，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不會提供其他單位，敬請安心填寫。您的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衷心期盼您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填答。感謝您的熱情支持與協助！敬祝 平安快樂，萬事如意！

1. 性別 (必填)

- ☐ 男
- ☐ 女

2. 請問您的學校性質？ (必填)

- ☐ 公立普通大學
- ☐ 私立普通大學
- ☐ 公立科技大學 (含技術學院)
- ☐ 私立科技大學 (含技術學院)

3. 請問您的年級？ (必填)

- ☐ 一年級
- ☐ 二年級
- ☐ 三年級
- ☐ 四年級

4. 請問您的服役情形？ (必填)

- ☐ 尚未服役
- ☐ 分階段服役
- ☐ 完成服役
- ☐ 不需服役
- ☐ 服替代役

5. 請問您的政黨傾向？ (必填)

- ☐ 泛藍
- ☐ 泛綠
- ☐ 沒有特定政黨

接上頁

題 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第一部分：資訊接收管道						
1. 您是從電視注意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	☐	☐	☐	☐	☐
2. 您是從報紙注意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	☐	☐	☐	☐	☐
3. 您是從廣播注意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	☐	☐	☐	☐	☐
4. 您是從網路注意有關於軍事訓練役的新聞報導。	☐	☐	☐	☐	☐	☐
5. 您是從學校教官、親朋好友注意到軍事訓練役相關訊息。 ⁵	☐	☐	☐	☐	☐	☐
第二部分：政治信任						
6. 我認為政府重視我國現行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戰力之影響。	☐	☐	☐	☐	☐	☐
7. 我相信政府有 能力制定完善兵役政策以維護我國國防戰力結構。	☐	☐	☐	☐	☐	☐
8. 我相信政府持 推行軍事訓練役制度之後，我國國防將會進步。	☐	☐	☐	☐	☐	☐
9. 我同意『政府對於兵役制度與國防戰力的風險，都會向民眾公開說明』這種說法。	☐	☐	☐	☐	☐	☐
第三部分：心理距離						

10. 我認為政軍事訓練役制度此刻正在危害國家與人民安全。	☐	☐	☐	☐	☐	☐
11. 軍事訓練役制度對現階段國防戰力造成的影響意味著我們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	☐	☐	☐	☐	☐
12. 下一代的人更有可能感受到軍事訓練役制度推行的影響。	☐	☐	☐	☐	☐	☐
13.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可能對像我一樣的人產生很大的影響。	☐	☐	☐	☐	☐	☐
14. 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一定會影響到我和我的家人。	☐	☐	☐	☐	☐	☐
15. 我不認為軍事訓練役制度實行會對我認識的人產生重大影響。	☐	☐	☐	☐	☐	☐
第四部分：風險感知						
16.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對損害我國國防戰力。	☐	☐	☐	☐	☐	☐
17.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衝擊我國軍力結構。	☐	☐	☐	☐	☐	☐
18.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無法因應中共軍力威脅。	☐	☐	☐	☐	☐	☐
19. 我擔心軍事訓練役制度在兩岸發生衝突時可能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	☐	☐	☐	☐	☐
第五部分：政策支持						
20. 有人認為政府縮短軍事訓練役役期縮能節省國防預算成本，來研發及購買高科技武器，也有人說役期縮短會損害國防戰	☐	☐	☐	☐	☐	☐

力與國家安全，我仍贊成軍事訓練役制度的實施。						
21. 有人說軍事訓練役制度對我國而言有害而無益，我同意這種說法。	☐	☐	☐	☐	☐	☐
22. 我認為政府應恢復 1 年制的義務役。	☐	☐	☐	☐	☐	☐
第六部分：自我效能						
23.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	☐	☐	☐	☐	☐	☐
24. 在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對國防安全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	☐	☐	☐	☐	☐	☐
25. 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軍事訓練役制度所造成之國防安全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	☐	☐	☐	☐	☐	☐
26. 改變我對政策的支持行動，將有助於降低軍事訓練役制度所帶來的威脅。	☐	☐	☐	☐	☐	☐
第七部分：行為傾向						
27.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不會逃避或延後服兵役。	☐	☐	☐	☐	☐	☐
28. 因應役期縮短帶來的國防威脅，服役過程我會更認真訓練。	☐	☐	☐	☐	☐	☐
29. 因應軍事訓練役制度可能的影響，我會更關注國防事務。	☐	☐	☐	☐	☐	☐